

[问题提起]

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

岩本 通弥
IWAMOTO Michiya
翻译：王京

前言——问题的框架

首先我想以俯视的视线设定一下我们为为期两天的日中韩三国国际研讨会“普普通通的日常/变动不居的日常——为何思考，怎样把握，如何记录？”的问题框架。

美国的日本思想史泰斗哈利·哈如图涅（Harry D. Harootunian）在其著作《历史的不安：近代性，文化实践，日常生活的问题（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日文版kobushi书房 2011年）中追问了战间期世界各地对日常性（Everydayness）展开思考的意义。

哈如图涅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搅乱社会秩序，带来变革的“日常性”这一追问（概念或思想）开始拥有迫切的意义，认真面对这一追问的学者，在德国，俄国等西欧以及日本等地几乎同时涌现出来。这是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中，消费文化迎来了烂熟期的时代，也是大众拥有构建，表达自己的日常性的历史的能动性（agency）这一事实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得以证明的时代（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5）。比本雅明，齐美尔，鲍里斯·阿尔瓦托夫（Борис Игнатъевич Арватов 1896-1940），海德格尔等人迫近“日常这一神秘”略迟，在日本也出现了今和次郎的考现学，戸坂润的《风俗与思想》（三笠书房，1936年）¹，而仿佛是与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1930年）（クラカウアー 1979）遥相呼应一般，日本的青野季吉也出版了《工薪阶层的恐怖时代》（先进社 1930年），以民族志的手法描写了白领阶层的窘态（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54-55），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性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就同时代性而言，他认为柳田国男等人创建的民俗学这门学问，也是在同样的视线中产生的²，将之置于思想史上相互关联的宏大视野中加以把握。

哈如图涅指出，各种潮流的共通之处在于“挽救业已失去的质性的时间，以知性的形式复活为科学与资本所损害的直接的主体性经验的努力”（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6）。近代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是“均质而空虚的时间”（ベンヤミン 2015：61）（《关于历史概念》1940年）。而哈如图涅以日本作为事例分析了现代性（近代）³对于非西方地域的意义，强调了超越本雅明的理解：即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均质，而是包含中心·周边不均等结构的全球性同时代体系。这一认识与其说是宏观结构论⁴，不如说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微观场面的生活经验及其话语，是生存于不均等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而获得的经验（樹本 2011：276），他称之为“日常性”，并指出在日本以外的非西方社会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1 “生活”——研究对象/生活变化与生活改善

1. 比较史视线下的生活改善运动

本研讨会第一部的主题是“生活”，目的是以生活变化，生活改善为对象，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在日中韩几乎同时显出雏形，二战后各自发展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研究，以及与包含冲绳⁵，台湾⁶的东亚各地区的比较，关注其同时代性与异质性，从而全面把握战后日常史性质的生活变化。

在日本，一般认为这些运动是战后在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开始的，以农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⁷为促进者（facilitator）的参加型开发运动⁸。然而1934年蒋介石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旨在通过衣食住行改革实现强国的目标，而先于日本内地实施了“生活状态调查”⁹的当时的殖民地朝鲜，为了对抗总督府自上而下的教化政策，1929年在朝鲜日报社的主导下兴起了“生活改新运动”¹⁰。我们希望如果加入比较对照史的观点，我们就能够对这些运动进行俯视的，多角度的探讨。

变革身边的日常这一动向，是战后韩国“新村(새마을)运动”的底流，在日本，1941年的《国民礼法》也对起居，动作等做了详细的规定。二者间的异质性当然显而易见，但其中也存在着某种倾向上的平行关系。聚焦于不值一提的，身边琐碎“生活”的这些运动，无疑对于人们的日常是一种搅乱，对作为对象的日常产生了较大的革命性影响。

2. 多领域对生活改善运动的兴趣

近年，关于“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不仅在民俗学，也在其他多种多样的学问领域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团队的渊源是田中宣一编《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事业与新生活运动》（農文協 2011年），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出版发行了大门正克编《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經濟評論社 2012年），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深町英夫的大作《规训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岩波書店 2013年），也继段瑞聪《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6年）之后，开辟了研究的新境界¹¹。

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正如刚才提到的两本书的书名一样，主要指二战后的农村事业及运动。例如认为1934年蒋介石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与1955年鸠山一郎首相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名称一致而已，这样缺乏理解的状况还占据统治地位，令人遗憾。如果将中国，韩国，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台湾的生活改善运动，以及战后冲绳的同类运动放在一起思考，不难看出这是东亚近代共有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动向。本研讨会的特色在于不把各国的运动视为各自无关的现象，而是放在东亚近现代发展中进行相对化的把握。在日本，“生活改善运动”一般包括总理府系统新生活运动协会的“新生活运动”与作为GHQ农村改革的一环，为实现农村民主化而于1948年开始的农林省系统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在改善的现场，二者并无区别）。

也有学者把战间期文部省的“生活改善事业”，或是开展类似事业的内务省的“民力涵养运动”，以及1932年开始的农商务省的“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等包含在内，这种情况下，一般把1920年设立的文部省外围团体“生活改善同盟会”看作其起点。其目的是从服装，饮食，住宅到社交礼仪等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与合理化，都市中流阶层（新中间层）的居住生活的改善被视为是其最主要的对象（久井 2004, 2012），普遍认为这些运动与前述两本书所论述的二战后的农村运动之间存在着背离。

另一方面，例如产业组合中央会等官方团体也开展过类似的事业，各府县或市町村政府也直接组织过改善事业，为了实现生活的改善而组织半官半民团体的例子不在少数，而像经济学者森本厚吉于1922年创立的“文化普及会”那样以民间推动的方式开展生活改善运动的例子也为数甚多（久井

online)。而先于“生活改善同盟会”存在过的，提倡节约减省及废除虚礼的报德社运动，町村规约调查运动以及地方改良运动，如果想视为具有同一倾向的运动也并非不可能。综上所述，确定生活改善运动的“外延”并不容易，但在此我希望重视“生活”这一词汇¹²作为Life, Leben等西欧语言的译词进入近代日语中时的本义。

3. 聚焦“生活”与“普通人”的日常变革

“生活”的基本含义是生存而活动，或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即使是长寿，如果不把“生”的品质当做关心的问题，也难以大量出现“生活”这一概念（森本 1921：4；中嶋 1974, 1975）。日本近世的类似表述有“渡世，生业，活计”等，但都只是为了生存下去的方式与手段，或是将人的一生视为从生到死的直线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内务省主导的“民力涵养运动”¹³，将“培养勤俭力行之美风，增加生产之资金，谋求生活之安定”（直线为笔者所加）作为五大纲要之一。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不仅有在地方改良运动中常常强调的作为儒教道德的“勤俭力行”，还出现了“生活”一词。不再停留于之前的观念论，而是正视现实人们的生活，将之视为可以改良的客体之时，生活才能显示出实体性的面貌。换言之，大战后随着工业化的正式展开以及城市人口的激增，居住于大城市的“生活艰难”的新中间层，即仅依靠工资为生的薪金生活者的出现，孕育了“生活”这一全新的概念（岩本 2011）。一方面，家庭收支调查，国势调查等对“生活”进行定量分析的技术得到开发和应用，而另一方面，民俗学作为运用与之相对照的手法，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学问领域，也在各国诞生（パウジンガー 2005：95）。柳田将民俗分为“生活外形/生活解说/生活心意”三部，他将《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以下，世相篇）终章的标题定为《生活改善的目标》，颇具启发性。在本次研讨会上，我希望重视民俗学起步时的这一设问的意义。

在致力于提高“普通人”之“生”的这些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民众自己也具有主体性的参与其中，重复着日常的实践。在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为了对抗总督府的教化政策，由朝鲜日报社主导的“生活改新运动”及东亚日报社的“到民众中去（v narod）运动”等，便是其典型。人们的生活是不会仅凭自上而下的政策就轻易变化的，日俄战争之后的地方改良运动也致力于风俗改良，极力宣传废除虚礼，修订或废除旧历，普及卫生观念，但收效甚微，不得不寄希望于下一时代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则不同，是由“普通人”进行的居民主体性参与的，具有创造性和社会良心的生活实践运动，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只有通过超前促进人们的消费观念，这一变革才能够得以实现。农林省的农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只不过是促进者。而在以战后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为“参加型开发”之模范事例的开发经济学或开发人类学的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开发时应用日本经验而获得成功的事例也告诉我们，推动事业的归根结底是“居民”的内发的动力。我们也不能忘记日韩中等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正是无数“普通人”能动，个性化（vernacular）的实践奠定了其坚实的基础。

4. 为何是“日常习惯的改善”

GHQ希望战后不久重新结成的青年会或妇人会能够彻底革除“国防妇人会”那样的御用团体性质，重视培养不盲从于指导者的，能够自主“思考的农民”。对于经济快速增长长期的历史，例如洗衣机，吸尘器，电视机，电饭煲，电冰箱等的普及，也许仅从家电企业角度，比如发明与市场营销活动来论述的研究将大量涌现，但至少我们民俗学者，从生活者的角度，正耳闻目睹着那些容易被埋没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阴影之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实践。

然而那一代人已经进入高龄，采访当事者，将之作为课题，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农村民主化的主人翁并积极改善身边的状况，大约只限于1950年前后到60年代前期。在韩国，

1970年代积极参与继承了战前运动的“新村(새마을)运动”的那一代人数急剧减少。在中国大陆，国民党转移到台湾后人民公社承担了生活改革任务，但1978年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公社在1983年之前就解体了。在之后的未伴随口号的时代，“普通人”是如何将生活秩序化的¹⁴，这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都最终将与现在的“此时，此地”相连，但深町提出的问题应该首先得到具体的讨论，即在国家陷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国难之时，为什么会发动改善从举止动作到日常习惯这样看上去是表面的，琐碎的问题的运动，并且能够动员大量民众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呢？（深町 2013：7-8）。

安装简易自来水系统，驱除苍蝇，蚊子，老鼠等家庭害虫，改造厨房（如改良灶台等），开办烹饪讲习会，开展浴室，厕所，排水改良等保健卫生事业，倡导遵守时间，改良起居行为，简化婚丧嫁娶年节等仪式，打破陋习，以至于开办计划生育，避孕方法的指导讲习会等，运动的活动多种多样，而这些与农林省的生活改良普及员及农业改良普及员，厚生省的保健妇等各种要素的关系，其具体情况已经变得模糊。这些活动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按照怎样的发生机制和顺序，进入各个地域，各个家庭之中而被消费的？通过日中韩的比较对照，哪些是一致的，又有哪些是不同的？我们希望能够对“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进行详细的记述。韩国的“新村(새마을)运动”，日本没有苍蝇蚊子的生活，中国的厕所革命，在年代与具体状况上各不相同，但都是“普通人”致力提高自身之“生”的运动，通过自觉地把握已经司空见惯的身体动作等极为平常的日常“生活”这一领域，而促使自身的“生”更具活力，这是值得称道的同时代的“新纪元”。

2，“日常”——核心概念/各自的接受与发展

第二日上午的第二部，主题是“日常”，考察这一概念在日中韩各自的接受与发展。本研究项目进行至今，一直未对“日常”这一概念予以明确的定义，这是因为考虑到有着多样的接近方式——正如哈如图涅为我们展示出的宏大图景一样——，不愿限制其范围。但毋须讳言，在其背景中是有着德国民俗学的“日常”概念的（李 2015）。

“日常(alltag)”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从1970年法尔肯施泰因原则以后到80年代末左右，得到较大发展，卡罗拉·利普(Lipp 1993)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与社会学，历史学的交集之处，日常文化的研究变得日益丰富。在“工人文化(Arbeiterkultur)”这种在日本还颇为生疏的领域，其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与“日常”概念有着共鸣。各国的国情对日常研究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就我知道的事例，比如韩国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日常生活(살림살이)研究及其资料库，相关情况我曾做过介绍（岩本 2015；金 2016），在此不再赘述，而只想介绍一下市立的首尔历史博物馆的相关研究与展示。2014年到2017年的特展中，除了以我们上次研讨会的主题高层集合住宅为对象的“公寓人生”，还有“首尔的肉店”，“请回答！1994年及之后的20年”，“新林洞的青春——考试村的日常”，“印刷世界——仁岬洞印刷一条街”，“公寓森林北首尔”，“南大门市场”等一系列大胆的组展。博物馆每年都会几乎定期的举办数次关注日常或是日常史的特展，从其韩语版主页，可以免费下载这些展览的展示目录(e-book)。其中“新林洞的青春”描写了预备学校及其学生居住生活的街区的日常，作为民族志十分出色。

什么是民俗学中的“日常”？以下简单引用海尔加·根特(Helga Gerndt)的德国民俗学入门书的内容。

“民俗学是研究较广范围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视线投向过去及现在的文化表现。民俗学追问的，是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会成为理所当然。即，与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验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在过去以及现在塑造自我这一存在的。”（根据法桥量日文版翻译）（Gerndt

1997 : 25)

不仅仅是追问日常生活,这里包蕴着追问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日常化)的视线。我在相关报告中,将再次关注阿尔布雷希特·莱曼(Lehmann Albrecht)的“日常的叙述”¹⁵。不仅仅是“普通人”司空见惯的生活这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日常,在此,也包含着如何把握(埋没于日常之中)的“理所当然”这一作为方法的日常的问题。德国的“日常”,在各国民俗学的接受情况不尽相同。到底有着怎样的接受的形式,希望本次国际研讨会能够成为大家相互切磋的平台。

3, “世相”——研究方法/如何把握,记录变化的日常

第二日下午的第三部,主题是“世相”,讨论我们如何从方法上把握,记录变化着的日常。从根特的定义中也可以知道,应该采取的是关注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的,包含着变化的接近方式,但问题在于无论我们如何对“此时,此地”进行民详细的族志式的记述,转眼间它就将变质,成为“过去的那里”。笔者也在都市民俗学的名下,关心着每时每刻的现在,但时代是变化的,观察和结论无法长久,是最大的烦恼所在。

而另一方面,提起“世相”,当然是指柳田世相篇中的那个“世相”。该词最初见于斋藤隆三的《元禄世相志》(博文馆 1905年),是新造出来的词,在中国或是韩国是没有这个汉语词的。意思相近的汉字圈内共通的词是“世态”,但“世相”作为新词,主要是想指示时代精神,社会状况或风俗中共通的时代特征,或整体面貌(“相”)(岩本 2002)。柳田也称其世相篇是“作为描写社会之变化,即风俗之书而作”(柳田 1954 : 3),可以说这一用语是聚焦于变化不居的日常的,变化这一侧面的。

“此时,此地”这一稍瞬即逝的日常,和“追究其与眼前新现象之间联系的路径”(柳田1993 : 19)的世相史意义上的日常,怎样才能相互结合起来?为了避免前者的研究变成时间不定,现住所不明,所在地不明的民族志,我们有必要对此展开具体的讨论。

除了日本的几位,其他报告者也许对日常的变化或世相的言及较少。但大家讨论的“生活世界”“生世界”“空间实践”等概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与外界的联系,生活本身就无法成立,因此从这些考察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个人,也能看到与个人相联系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世界”不仅仅是处于判断以前的,知觉性的直观的环境,也是主观与他者共生的相互主观,间主观的交流所编织的,具有文化沉淀的日常实践累积而成的世界。

结语

仅凭本次的讨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此时,此地”留下足迹,正是哈如图涅强调的“日常性Everydayness”,能够改写我们未来的活生生的经验。

哈如图涅说“都市的日常性生产出来的各种记号,作为生存的现在的个别的经验与其历史性差异的特征,应该理解为‘残像’,是过去‘现实化(actualise)’的痕迹——现在在其中以新的不同的配置而现实化”(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54)。换言之,“残像”是“过去‘现实化(actualise)’的痕迹”,而现在在不同的配置下现实化,即生活实践对文化¹⁶地方性(vernacular)的再配置。

“日常性所包含的意义,是‘此时’使待机于现在的过去现实化的方法。这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曾在(Gewesenheit)’,而是‘虽被忘记,但又无法忘记的东西’”(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 55)¹⁷。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理解:“使待机于现在的过去现实化的方法”,是指以“过去=文化”为参照的,

现在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现实。为了不让过去成为恶灵,我们必须以日常性的“此时,此地”为起点。

注释

- 1 同 在2000年刊行的 *Overcome by Modernity :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日文版 *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中的论述更为具体详实。该书与以日常性思想的世界史视野下的同时代性为宏大主题的《历史的不安》,可以看作是相互呼应的姊妹篇。
- 2 关于柳田,比起 (*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国民的物话、亡灵的出现—近代日本国民主体的形成》(*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0) 中以柳田及民俗学为中心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议论。他高度评价了柳田《都市与农村》、《明治大正史世相篇》等一系列著作,但也在注4所述的意义上,在与折口信夫并置的脉络中,将民俗学定位为“亡灵的出现”。
- 3 哈如图涅及其译者区别使用了“现代性modernity”与“近代”。在以河上彻太郎等13名评论家于1942年举办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前述 *Overcome by Modernity* 一书中,他认为“近代这一词语,掩盖了艺术、文化、政治等体制的固有性”(*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 viii)。
- 4 他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分断以及碎片化的生活中,“产生了虚伪地保证能够重新获得一体化的话语。指向‘永恒’这一理念的冲动,在工业化逐步发展的20世纪20~30年代,通过马克斯·霍克海默所谓‘崇高的自我欺骗’,正像在纳粹对民族共同体永存的确信,或是在相信超越历史的理念或是价值能力的观念论哲学中可以见到的那样,得到了具体的表现”(*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 7)。
- 5 根据加贺谷真梨的研究,二战后在美军USCER统治下的冲绳开展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在以大学为普及事业的据点等方面,受到了美国式 *Home Living Improvement Research and Extension Program* 的较大影响(加贺谷 2017)。在日本本土,二战前以欧洲国家的生活合理化运动为模式的生活改善运动成为基础,二战后与农林省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及总务省系统的“新生活运动(简朴生活)”相连接并展开的。
- 6 关于日本殖民地时期以台湾原住民为对象的生活改善事业,请参照(山路 2004)。
- 7 最常见的说明是,在GHQ的指导下,以农民生活的合理化为目的,通过1948年的《农业改良助长法》(法律第165号)的实施,由农林省推广到全国的。
- 8 近年这些模式也被开发人类学式的加以应用,在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开发现场,都出现了改善运动。(太田 2004)对此有详细论述。
- 9 朝鲜总督府的《生活状态调查》,其地域篇从1929年的水原郡起共刊行了7册,进行了计量性的地域分析。在台湾,也先于日本本土的国势调查,于1904年开始了“临时台湾户口调查”。
- 10 作为日本殖民地统治下的运动,1932年开始由朝鲜总督府宇垣一成推进的“农山渔村振兴运动”影响巨大,但1929年朝鲜日报社开展的“生活改新运动”及1931年东亚日报社开始的“到民众中去(v narod)运动”的启蒙性质的刺激,以及受其触动而发展起来的民众运动也有着重要意义。前者开始时强调“增进健康、节约消费、废除虚礼、早起运动、色衣断发、普及常识”等6大项目,但不久变化成为“文字普及运动”。后者的主要目的也在于识字与数学启蒙,但都在总督府的压力下夭折了(松本 1996; 宫本 1998)。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总督府中枢院对家庭中的儒教式冠婚丧祭等仪式进行了整理及规定,于1934年颁布了《仪礼准则》,为1973年朴正熙大总统时期制定的《家庭仪礼准则》(大总统令第6680号)所继承(丁 2014),对今天韩国的民众生活依然有着影响。
- 11 此外,在社会设计学领域,有(小関 2015)这样聚焦于专业主妇主导的改善活动的考察,而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先行研究(久井 2008)在思考对象的外延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筑学领域关于生活改善运动的论文,从大正后期就以展示都市新中间层的生活“模范”而展开,可以说不胜枚举。在此,只提一本,即论述今和次郎的(黑石 2015)。
- 12 聚焦于生活的议论,在关于生活改善的先驱性研究(中嶋 1974)之后,似乎进展不大(本稿脱稿后,参阅了久井2016)。“生活合理化”这一词的流行,根据小关孝子的研究,是从1930(昭和5)年开始,关东大地震之前的生活改善运动为了让生活过得更有文化,也积极鼓励消费与娱乐,但在地震后其论调转向了对质朴生活的提倡(小関 2015 : 89, 64)。
- 13 所谓“民力涵养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五大项目为核心的各种事业的总称,以1919年3月床次竹次郎内相下发给各府县知事的训令为契机展开。请参阅拙稿(岩本 2008)。
- 14 与中国人民公社的连续性,以及之后的未伴随口号的生活改良实践这一课题,得自田村和彦氏的教示。
- 15 关于莱曼,请参照(Lehmann 2010)(岩本、法桥、及川編 2011)。

- 16 他还指出“形成活生生经验之条件的事物的细节”最为重要で，这样的事物的细节“融入了日常生活”(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54)。
- 17 他接下去说“所谓日常性，是不安的形式，是被悬置于半空的瞬间。那是新的现在，是以暴力打断传统，将过去所描绘的潮流与运动悬置的‘历史状况’”(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55)。

参考文献

- 李相賢, 2015, 「ドイツ民俗学と日常研究—ドイツチュービンゲン大学民俗学研究所の村についての日常研究を中心に」, 『日常と文化』1号(中村和代・訳)。
- 岩本通弥, 2002, 「世相」, 小松和彦・関一敏編, 『新しい民俗学へ—野の学問のためのレッスン26』, せりか書房。
- , 2008, 「可視化される習俗—民力涵養運動期における『国民儀礼』の創出」,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141号。
- , 2011 「家族をめぐる二つの生活改善運動—民力涵養運動と新生活運動」田中宣一編『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
- , 2015, 「“当たり前”と“生活疑問”と“日常”」, 『日常と文化』1号。
- 太田美帆, 2004, 『生活改良普及員に学ぶファシリテーターのあり方—戦後日本の経験からの教訓』,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国際協力総合研究所。
- 岩本通弥・法橋量・及川祥平編, 2011, 『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語り〉のアーカイブ化に向けて』, 成城大学グローバル研究センター。
- 小関孝子, 2015, 『生活合理化と家庭の近代—全国友の会による「カイゼン」と「婦人之友」』勁草書房。
- 加賀谷真梨, 2017, 「沖縄における生活改善普及事業の展開と受容」生活変化/改善研究会, 2017年4月15日発表。
- 金賢貞, 2016, 「韓国民俗学は「当たり前」を捉えうるか—韓国国立民俗博物館の二つの民族誌(2007～14年)を中心に」, 『日常と文化』2号。
- 樹本健, 2011, 「訳者あとがき」, ハリー・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歴史の不穏』, こぶし書房, (樹本健・訳)。
- ジークフリート・クラカウアー, 1979, 『サラリーマン—ワイマル共和国の黄昏』, 法政大学出版局(神崎巖・訳)。
- 黒石いずみ, 2015, 『東北震災復興と今和次郎—ものづくり・くらしづくりの知恵』, 平凡社。
- 丁世絃, 2014, 「近代期の韓国における儒教儀礼の変化」,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7号。
- 中島邦, 1974, 「大正期における『生活改善運動』」, 『史艸』15号。
- 中島邦, 1975, 「大正期の生活論」, 和歌森太郎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編輯委員会編, 『明治国家の展開と民衆生活』, 弘文堂。
- 中野智世, 2008, 「『家族の強化』とソーシャルワーカー—マリー・パウムの『家族保護』構想から」, 川越修・辻英史編, 『社会国家を生きる—20世紀ドイツにおける国家・共同性・個人』, 法政大学出版局。
- ヘルマン・パウジンガー, 2005, 『科学技術世界のなかの民俗文化』, 文揖堂(河野眞・訳)。
- ハリー・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近代における超克—戦間期日本の歴史・文化・共同体(上・下)』岩波書店(梅森直之・訳)。
- , 2010, 「国民の物語、亡霊の出現—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国民的主体の形成」, キャロル・グラックほか, 『日本の歴史25日本は何処へ行くのか』, 講談社学術文庫(樹本健・訳)。
- , 2011 『歴史の不穏—近代、文化的実践、日常生活という問題』こぶし書房(樹本健・訳)
- 久井英輔, 2004, 「大正後期・昭和初期の生活改善運動における〈都市〉と〈農村〉」, 『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部紀要』44巻。
- , 2008, 「戦前生活改善運動史研究に関する再検討と展望—運動を支えた組織・団体をめぐる論点を中心に」, 『兵庫教育大学研究紀要』32巻。
- , 2012, 「大正期の生活改善における〈中流〉観の動向とその背景」, 『広島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61号。
- , online, 「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生活改善運動の概観」, 『生涯学習研究 e 事典』, 最終アクセス日: 2017年4月20日: <http://ejiten.javea.or.jp/content.php?c=TWpRek5qTXo%3D>
- 久井英輔 2016 『生活をめぐる啓蒙と〈中流〉の近代史—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生活改善運動に関する検討を中心に』 青山学院大学大学院教育人間科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 深町英夫 2013 『身体を養える政治—中国国民党の新生活運動』岩波書店。
- 藤原辰史, 『ナチスのキッチン—「食べること」の環境史』共和国, 2016年。
- ヴァルター・ベンヤミン著, 2015, 『[新訳・評注]歴史の概念について』, 未来社, 鹿島徹訳・評注。
- 松本武祝, 1998 『植民地権力と朝鮮農民』社会評論社。
- 宮本正明, 1998, 「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生活改善」問題の位相」, 『史観』139号, 早稲田大学。

- 森本厚吉, 1921, 「呪ふべき二つの生活」, 『文化生活』1巻3号。
- 柳田國男, 1954, 「総説」, 柳田國男編, 『明治文化史—風俗編』洋々社。
- , 1993, 『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講談社学術文庫(初出:1931、朝日新聞社)。
- 山路勝彦, 2004, 「『文明化』への使命と『内地化』」, 『台湾の植民地統治』, 学術出版会。
- アルブレヒト・レーマン, 2010, 「意識分析—民俗学の方法」, 『日本民俗学』263号(及川祥平・訳)。
- Gerndt, Helge, 1997, *Studienskript Volkskunde. Waxmann* (ヘルゲ・ゲレント1997『民俗学研究法』)。
- Lipp, Carola, 1993, Alltagskulturforschung im Grenzbereich von Volkskunde,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ines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skonzepts.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89.Jg., (カローラ・リップ 1993「民俗学、社会学、歴史の境界領域としての日常文化研究—学際的な概念の上昇と下降」『民俗学雑誌』89巻)

有关传承和陋习的认识

田中 宣一
TANAKA Sennichi
翻译：宗晓莲

1. 日常 非日常 反日常

我们没怎么在意的“日常”，是由“传承”支撑的。传承是从人类社会形成时应该就已经存在的文化，只要社会继续存在，今后也会继续存在。我们可以将生活看作以日常为中心展开，不时夹入比较有规律的非日常，突然混入反日常，如此这般，不断延续。人们一般参照“俗”与“圣”的对比，试图以“日常”与“非日常”的二元对立来理解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为了正确把握生活的实态，也不能忘记“反日常”。

在这一场合，“日常”指的是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以及劳动等每天的营生，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这些活动的重复。“非日常”指的是在固定的月日，季节，在人及群体的成长变化的关节点，按照约定俗成举行的庙会，节日，仪式等，这些也是反反复复举行的，然而不是每天反复的，所以笔者倾向于将这些活动的举行看作非日常。所谓的“反日常”，指的是不规则的，突然出现的各种灾害，事故那样的事态等，当然无需说明，战争也是反日常的。如果生活只是在日常和非日常的反复交替下不断推移，那么平稳无事，当然很好。然而有时也无法回避突然混入的反日常，就会出现令人遗憾的局面，正如历史所教给我们的那样。

传承和传承文化研究

那么，究竟传承是什么？我是如此考虑的：

由很多人以口头反复传播的事项(如故事歌谣，规范，伦理观等等)，通过口头或是身体行为继承的动作，技术以及互助合作的方法，以及通过心领神会而不断继承下来的各种观念。

另外，笔者认为，传承不仅仅指继承下去的内容，包括传达，继承行为本身也是所谓的传承文化。

如此这般的传承，在上文所述的日常和非日常的各种时间，场所都被广泛地认同，集团性，类型性，持续性是其特征。反日常的场合，虽然也存在可以看作传承的行动，但是所谓的反日常通常是某一事件突然发生，如何行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作相应的判断，因此无法依赖传承。

上文中提到传承的类型性，持续性，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根据周围的情况被适当地改变，或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某些内容消失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刚才还提到被集团性地继承的特点，然而传承的团体有大小，集团本身也存在兴衰的问题。因此，传承在有着持续性的特点同时，长年累月中发生变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如上所述，在将传承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或以传承为资料进行研究时，有必要用文字对传承的内容作记录，或以录像，绘画，图像等手段将其定影。

然而，应该是从人类社会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也可能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的传承内容，由于其过于理所当然，我们对于传承的认识，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是很淡薄的，将传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体系性把握的事更是迟迟没有出现。因此，虽然日常，非日常的活动不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然而，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将传承文化以文字进行描述，或是以绘画进行记录。

不过，我们也并不是完全什么也没记录。在庞大的传承文化中，可能只是九牛一毛，然而，以古代的日本来说，有关国家的成立的传承在《古事记》中有总结，各地的情况则以诸《风土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之后的历史时代里，贵族士大夫们的日记，游记等记录流传下来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生活。此外，应时代的需要而编纂的朝廷，大臣和武家的记载了各种仪式，制度，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的文书和法令中，也包含了很多当时作为习惯法而被传承继续的事项。

到了更进一步的江户时代，也就是17，18，19世纪，在本居宣长那样的国学者之间，出现了积极试图理解地方传承文化的意义的人物，幕府官僚屋代弘贤使用了名为《诸国风俗问卷》的问卷调查，比较各地的节日庆典，祭祀庙会等，出现了试图理解传承下来的各种事项的意义的萌芽。可能是因为处于相对比较安定的时代，还出现了菅江真澄，古川古松轩那样到各地旅行，将在各地所见所闻的日常生活进行详细记录并流传下来的人。这些记录下来的传承文化，成为贵重的资料。

这样的重视各地的传承内容，并进行记录，传承的人在当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多情况是仅仅出于兴趣本地地记录了各地稀奇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因为觉得是奇风异俗而进行记录的，仅仅是这样的水平。

到了明治时代，由研究者编纂的《人类学杂志》（《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开始刊行，对欧洲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另外，与各地的各种文物的发掘出土一起，传承也被积极地介绍，传承文化到这一时期才终于成为研究对象。然而即使是这一时期，也还很难摆脱将传承看作奇风异俗的想法，可以说，还没有达到思考地方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意义的阶段。

在日本，确实实地意识到传承中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的，是明治41年（1908），柳田国男拜访九州宫崎县椎叶村时，接触了当地的日常生活及其他传承活动，意识到对研究文化来说传承的重要性的时候。此后，柳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寻找其中记载的有关传承文化的内容，在将其作为研究材料的同时，如果有关心的问题，则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柳田之前，还没有人意识到传承的丰富内涵，因此，记录下来的传承资料非常之少。因此，柳田和受到柳田影响的同仁一起，对各地当时以各种形态存在着的传承进行积极地记录，并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推进研究。昭和10年（1935）前后，还对文字化记录了的传承进行分类，在明确传承文化的总体像的同时，尝试着确立相关的研究方法。至此，作为担当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学科，新的民俗学在日本诞生了。

如此这般，民俗学者奔赴各地进行更多的传承文化调查，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作为研究者间共有的研究资料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

2. 追溯古老传承的调查

笔者进入大学，开始关心民俗学，并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的是在昭和30年代中期，也就是1960年前后。

那时，与其他各学科相比，民俗学是一门新学科的说法很盛行。也因为此，民俗学的资料积累

还不够充分，必须到各地收集更多的传承资料。与此同时，我们还被要求在各地调查的同时，实地感受传承。笔者也不例外，开始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地至那时为止还没有记录保留下来的保持当地社会运营的实在形态，庙会祭祀，节日庆典，人生过渡礼仪等进行访谈记录。然而，我们当时更热心追寻的是当时已经消失的，发生很大变化的传承的以前的模样，比起当时正在进行的传承，我们更多打听的是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战前时代，也就是说1880年至1940年左右的各种情况。

民俗学中经常说的，为了回答现在的疑问，追溯其形成路径，尽可能地明确其变迁形态，是得出正确答案的重要前提，我们这样做也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考方法。

为此，我们在自己的调查地，走访那些已经离开劳作第一线，然而经验了前一个世代的老人，打听他们青壮年时期的的经历，向他们请教经历过的各种体验。在古老传说的前一时代中，可能有着更以前的传承内容，因此想知道尽可能更从前的事。从老人的嘴里打听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各种有关从前的说法，仿佛闯入了一个未知世界似的，很兴奋，同时也找到了通过这样的活动记录，积累从前的事实的意义。当时的很多民俗学者都是这样做的。笔者觉得这样做并没有错，而且是今后也应该继续的工作。

然而，接着也产生了只是做这样的事就可以了吗，这样的疑问。为了回答现在的疑问，试图了解过去的行动，不知不觉之中，忘记了正在经验的现在。了解古老的事，更古老的事本身仿佛成了目的。即使是追溯了往昔的事，甚或是更往昔的事，然而所谓的往昔实际上是没有界限的，同时古老的记忆通常也很模糊暧昧了。是不是记错想错了呢，这样的情况也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注意到，这样的忽视当今实际情况的做法将没有什么成果。

3. 直视当今传承的变化

我们开始意识到，就在我们眼前，各种事态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对这些事项也必须予以关注。当时，也就是昭和30年代后半期至40年代(1960年~1975年左右)的日本，正处于高度经济成长期，机械化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极大变化，基于水稻种植农业的庙会祭祀，节日庆典也在不断变化。随着石油输入的增加，能源革命使得薪炭业无法维持，农家的炕炉也在不断消失。结婚和生孩子的仪式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更加正视这些现在的变化的样子，进行正确的记录，追究其主要原因。另外，在很多事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有一些事项却完全没有变化，那些难以变化的事项是如何传承的？其不发生变化的理由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

4. “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

昭和51年(1976)，我开始在成城大学工作。在逐渐了解了大学状况的过程中，笔者知道了该大学保存了“山村调查”的笔记。

所谓的“山村调查”，是从昭和9年(1934)开始的3年间，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乡土生活研究所的同仁们分工合作，到全国六十个左右的农村，山村调查当地的传承生活，并以笔记记录保存的研究课题。

调查者们带着印刷了100个调查项目的统一的笔记，进入各自的调查村落，对可以说是至今为

止几乎没有留下过记录的当地的传承进行调查，记录，并思考。这些在同一时间，以相同的项目调查了的记录，当时谁也没有使用，只是妥善地保管在大学的《柳田文库》中了。笔者阅览后，觉得虽然在内容上有粗略细致之别，不过内容很充实的笔记很多。让这些贵重的资料一直束之高阁是何等可惜，笔者开始思考该如何将其活用。

经过与先辈老师们商谈，在同事和研究生们的协助下，开始了对“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该调查是从昭和59年（1984）开始，为期3年。昭和59年，刚好距离于昭和9年开始的首次“山村调查”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里，经历了战争，战后的混乱期，以及其后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对日本来说，此五十年是极为动荡的时代。本次调查主要是想了解，经过这样的五十年，笔记中记载的事项在各地域现在是被如何传承的，同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已有的明确的记录，将五十年前作为开始点，试图明确此后发生的变化。

5. 追踪调查的成果

有关“山村调查”的跟踪调查的成果，已经有公开的发表，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不多赘述。不过，正如调查前预料的，几乎是所有的事项都发生了激烈变化的预测，经过调查进一步明了了。另外，有关变化的原因也进行了各种分析，这些分析也已经发表了，这里不再赘述。

然而，战后，以政府为中心发起的各种计划，以及全国各地自治体和各地方响应这些计划而积极推行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和新生活运动被明确为变化的要因之一，坦率地说，是笔者的预想之外的。

可以说，在那之前的民俗学，对国家的政治动向，政府的政策等等不太关心。一直以来，民俗学在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时，调查各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记录各地方的祭祀庙会，节日庆典，追溯婚姻的变迁，关注民间信仰等等。然而，通过这次跟踪调查，可以明白地方的各种传承，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民俗学也有必要关注这些方向的想法开始出现。

6. 生活改善的诸运动

所谓的生活改善运动，可以说，是指为了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由政府提出，推进诸政策，受其启发，各地方自治体，地方的各团体以及各家各户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各种创新和付诸的各种努力。是在“政府”企划，启蒙的同时，作为其启发对象的“民众”明确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努力并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运动。虽然对于改善的“善”该如何理解，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不管怎么说，生活改善是官和民结为一体，一起参加的运动。

近代以来，在各个时代背景下，推进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改善运动。然而，人们最热情地加入，成果也最大的可以说是二战后的十多年间进行的这一次运动。原因是，战败后人们的精神颓败，物质生活上也非常困乏，采取什么行动，从如此混乱的状况中站起来已势在必行，官·民都是拼了命一样地参加各种活动的。

这一时期的运动，由以下四大支柱组成。

(1) 农林水产厅主导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

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改善农业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虽然这非常重要，不过只做这些还

不能改善农村，山村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想法下，由农林水产厅主导，推进了此运动（渔业也同样如此）。在致力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将农，林，渔民个体的健康，家庭消费生活本身等作为独立的问题，该运动正是基于这一新思想而推行的一次实践活动。

为此，昭和23年(1948)，农林水产厅内新设了生活改善课，其内部进一步分设了居住生活，饮食生活，衣着生活，家庭管理以及保健育儿等科室。以生活改善课为中心，之前没有考虑过的农，林，渔家的衣食住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安排，家庭内女性地位的提高，家人的健康（特别是婴幼儿的健康成长）等等都被列入企划内容，从而达到总体上改善农，林，渔村村民们的生活的目标。

政府在从总体上调整制度的同时，通过考试招募，培训了生活改善普及员，实际进入各地方，对生活改善运动进行启蒙，普及。生活改善普及员都是女性（最多的时候全国有2000名以上），她们在各地巡回，召开讲习会，座谈会，说明改善生活的必要性。生活改善普及员们还积极推动，帮助由当地女性（特别是年轻的主妇们）组成生活改善小组，以居民为主体寻找需要改善的问题，并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完善了村民们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是只提出口号，发出号召，而是培养，推进地方付诸实践活动的能力。

作为其结果，根据报告，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果：

炉灶的改良 厨房，供水系统的改良 浴室的改良 保存食品及面类食品的烹饪水平的提高 小家畜家禽(山羊，鸡)的饲养(为了得到奶，蛋) 农忙期集体合作做饭菜活动的实施以及临时保育所的开设（由此可以减轻家庭内女性的负担） 工作服的改良 苍蝇，蚊子的共同驱除

由此，人们的营养，卫生等方面都得到改善，充实，同时，通过炉灶，厨房等的改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由于这些方面的成功改善，女性们逐渐有了自信，地方中有关女性的评价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2)新生活运动

上文介绍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主要目标是提高当时被认为是有点落后的农山渔村的生活，以及推进那里的女性在家庭内劳动的合理化等，与此对应，新生活运动则是在都市部及单位内推进，以全国国民为对象，主要是着眼于精神生活层面的改善运动。

政府机关中的主要担当机构是设立于昭和30年(1955)的新生活运动协会。新生活运动协会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民形成合理，民主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国民要以勤劳为贵，注意浪费铺张，奖励储蓄，废弃古老封建的人际关系及习俗，推奖良风善行，努力改善衣食住生活。这些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近代以来，由政府主导试行了很多次，然而，到那时为止，都没有取得什么可以称道的成果。

然而，这一次的新生活运动在实施方法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那就是，不是由政府出面站在前面主导，而是在与地方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工作单位等团体保持充分联系的基础上，对地方的运动进行支援，推进。由地方组织，民间团体等提出需要改进的问题点，国家尊重相关团体自觉自主地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作为政府机关的新生活运动协会派遣讲师指导，启蒙发现问题，并向地方，团体提供已经采取行动的其他地方及团体的信息，举行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并对实施行动的团体予以财政援助，也就是说采取的是从侧面对运动进行支援的立场。

各地具体实施的活动非常多样，笔者对这些活动内容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 A 公众道德水平的提高 相互帮助运动 振兴健康合理的娱乐活动
- B 红白喜事的简朴化 排除生活方面的浪费行为 储蓄和家计的合理化 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
- C 日常仪式, 习惯的改善 迷信, 陋习的打破
- D 衣食住的改善 保健卫生面的改善 消灭蚊子和苍蝇运动
- E 有计划地生育

D的内容与生活改善普及运动及下文提到的保健所的活动有重叠之处, 其他都是只是新生活运动推行的活动, 下文(4)中提及的公民馆协同进行的活动也有很多。虽然不是马上显示出效果的内容, 然而逐渐影响了地方社会的传承活动。

(3)保健所的活动

以保健卫生为中心, 负责改善国民生活的是厚生厅, 在各地方, 则是以保健所为中心进行活动。保健所主要做的是结核病的对策和传染病的预防, 母子保健, 改善营养和食品卫生以及有关公众卫生的问题等。

然而, 不改善生活方式, 生活环境等就无法改善上述问题, 因此, 保健所也积极参加了生活改善运动。农山渔村的保健, 育儿方面的改善工作, 由于与生活改善普及运动相关, 在各地方都已经开展, 实现没有蚊子, 苍蝇的环境也与新生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致力于维持, 提供国民的健康状况以及改善地方的保健卫生情况的保健所的工作, 有着极大的意义。

(4)公民馆的活动

公民馆是文部厅管辖下的社会教育设施。为了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和普及, 废除封建思想, 公民馆积极推行了公民教育, 并开展地方教育文化活动。在这里, 同样存在如果不改善生活本身就很难取得成果的问题, 因此, 最初时, 也积极开展了卫生活动, 婴幼儿的定期健康诊断, 公共浴场, 共同做饭, 公民馆结婚仪式, 保育托儿活动等有关生活福祉的活动。因此, 对作为改善对象的地方民众来说, 上文所述及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 新生活运动, 与保健所所开展的活动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 对于封建思想保留较多的地区来说, 积极促进了居民的生活解放, 地方民主化活动的公民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 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 为了实现结婚仪式的简朴化而实施的公民馆结婚仪式也是不可忽视的。

正如上文(1) - (4)所综述的, 可以说, “官”方的生活改善运动主要由四大支柱组成。因此, 本文中使用了生活改善“诸”运动这一说法。

不过, 理解这些运动的意图, 并积极付诸于实施的地方民众, 并没有对这些运动进行明确区分, 而是将此作为同一的生活改善运动理解, 实施的。

其结果是, 总体上来说这些运动的目标基本达成了。目前, 农林水产厅内的生活改善课已经废止。新生活运动协会也改变名称, 进行了新的活动。保健所, 公民馆则作为地方的重要设施继续存在, 然而不再以生活改善为主要活动目的了。

7. 诸改善活动中有关陋习的认识

从人类社会出现就应该存在的传承这一文化, 对社会的形成和维持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存在。虽

然与非凡的思想，大发现，大事件相比较，在创造性特征，领导世界的能量方面有所欠缺，然而在维持社会的安定方面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虽然确实在慢慢发生变化，不容易变化也是其主要特征。

上文中提及的政府有关生活改善运动的各种政策，对各地方一直以来的传承活动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可以说，以政府认为是“善”的方向试图对地方的很多传承活动进行了改进。从具体活动内容来说，政府认为是“善”的，包括卫生的，健康的生活环境，金钱方面物质生活的安定，互助合作的精神，合理性的思考等等，试图将人们的生活向这样的方向引导。这也是一般的事项，所以笔者也理解。

然而，如果以这些为“善”，那么该如何看待诸如下例的各地传承活动。例如，祭祀庙会，节日庆典等仪式中的浪费及仪式性的偷窃，集会时的冗长拉杂的闲聊，杂谈，对寺庙神社的过度祈愿，各种消灾仪式，婴儿出生后的各种仪礼，以及婚礼，葬礼时的各种赠送习俗等等。从改善运动的立场来说，这些也应该是改善的对象，然而如果将这些活动一律视为陋习，马上进行强制性的改善，地方的民众可能会觉得生活干燥无味。即使在该地域之外的人看来可能是浪费，不合理的，然而对当地人来说，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代代相传下来的。诸如此类可以说基于各地方的伦理，长期以来已经刷入当地人心底的各种风俗习惯，推进政策的人也必须对此保持理解的态度。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打着“善”的大旗，对这样的传承进行强行改善，地方居民必然人心动摇，甚至导致人们的反抗。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可能就会比较困难。现实生活中，祭祀庙会时的浪费似乎有所复活，婚礼的简朴化也很难说已经得到理解并实行。人们对非生产性的手工制品的看法也有变化。另一方面，地域内的互助协同精神在减少的感慨之声不时可以听到。民俗学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虽然有必要思考，不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不存在绝对的基准，民俗学也没有能力给予裁定，或是给其指明方向。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关注，对于那些自己的传承被看作必须改善的“陋习”而被指导的人们来说，为了真正过上精神愉快，物质富裕的生活，各个人到底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为什么拒绝，对于持续至今的传承，只是改变其中的什么方面。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观察，分析，努力正确理解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向。

东京都多摩地区生活改善运动的诸相 ——以立川市砂川为例

小岛 孝夫

KOJIMA Takao

翻译：孙敏

序言

我们认为“日常生活”的各种事象是“理所当然”的。通过理解这些“理所当然”的事象是何时，如何日常化的，能够客观把握“日常生活”的形成和变迁。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基点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的各种生活改善运动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当地社会“理所当然”的生活事象是以当地环境为背景而创造出来的。同时，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日中韩等国共振发生了各种生活改善运动，二战之后又分别作为各国政策而展开，这使各种事象扎根下来，成为现在我们共有的“理所当然”的事象。

作者的研究团队（生活改善/变化研究会）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的各种生活改善运动对我们现在“理所当然”这一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将报告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探讨日本生活改善运动的研究课题及其可能性。

1 为何研究——日本生活改善运动的历史意义

生活改善运动是作为二战后民主化政策的一环而开展起来的，虽然作为政策是在日本全国普及的，但对于在各地的区域社会中经营着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共有的是为了在当地社会维持安定的生活状态而继承下来的意识和价值观，因此平均化的“生活改善”政策未必会被理所当然地接受。莫不如说，有的事象也是经过一段时期对政策的反抗，对抗才被过渡性的接受下来的。

事实上，日本的各种生活改善运动是各地居民自觉摸索改善生活的活动，是昭和30年(1955)左右开始的日本高速经济成长的伏笔，同时也形成了今天日常生活的根基。以改善生活为前提，当时的农林省等开展了生活改善普及事业，新生活运动协会主导了新生活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的契机，对现在日常生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一转变过程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就淹没在之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大转变——高速经济成长期中，因此作为民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高速经济成长这一日本社会的大转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其中有一个把日本社会的旧有基础灵活分解的过程，我们必须对其后的重建过程进行研究，这一过程既是人们对生活改善运动这一政策的接受，对抗的过程，也正是我们走向现在“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的摸索过程。

2 如何把握——成城大学关于生活改善运动的研究

田中宣一编著的《生活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从民俗学的立场，大门正克编著的《新生活运动和日本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从历史学的立场进行了研究。非常偶然，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这也可以看出，对生活改善运动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在民俗学和历史学这两个领域是有共识的。同时，通读两书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虽然根底的问题意识是相同的，但民俗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是接受和反抗政策的人们的实践和与之伴随的记忆，而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主要是关于政策的记录，所以要把研究成果直接联系起来也是有难度的。通过两书的刊行，可以共享关于生活改善运动的全貌的基础文献，但必须对各自的研究视角进行统合。因此，生活改善/变化研究会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在继承前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对行政方的活动进行留意。

前者的研究概要如下所述。此书是以曾在成城大学就职的田中宣一名誉教授为中心的，民俗学的研究者和以农林省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的协作成果。从平成16年(2004)开始历经5年，历次研讨会报告了各地的事例，实证性的探讨了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这一成果除了公开出版之外，还反映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现代展示的展示构想中，成为在博物馆的展览中介绍生活改善运动的历史意义的嚆矢。以田中为中心的研究活动以出版成就为标志暂时告一段落。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岩本通弥主导了“面向东亚构筑‘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日中韩与德国的研究协作网的形成”课题，成城大学的研究团队作为生活变化/改善研究会参与其中，以田中，大门的研究成果为基轴，开始把各地的生活改善运动数据库化。为了验证生活改善运动在全国的开展与差异，从平成26年(2014)至今，以各地政府部门发行的宣传杂志等的记事为资料，把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情况数据库化，并召开研讨会对其成果进行检验。为了把田中和大门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也为了方便确认资料所在等，对象地主要选择了多摩地区的政府部门。具体来说，对象地包括清濑市，国分寺市，调布市。同时，新生活运动协会的活动状况作为前者的研究对象并未得到充分分析，因此，为了把握其活动的实际情况，也开始对新生活运动协会的活动记录进行数据库化。

3 如何记录——立川市砂川的采访事例

作为理解生活改善运动的方法，为何选择了制作数据库呢？作者自身在进行生活改善运动相关调查，地方政府机关杂志的相关调查时，也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经验。平成10年代为止主要调查了埼玉县下面的地方政府，在进行调查时，相关资料几近废弃，生活改善运动施行当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也退休了，从当时的相关人员那里收集资料，对他们进行采访都非常困难。调查方法似乎只有在地区内进行采访了。具体实施生活改善运动的世代是昭和10年代至20年代迎来婚期的一代人，是出生于大正时代到昭和10年的一代人。当时对这一代人进行采访已经很困难了，能获得生活改善运动相关数据的机会也非常有限。之后探寻被采访者的状况就变得更加困难。田中宣一编著的《生活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的记述内容也是在相同情况下的研究成果，其前提就是意识到采访当事者是很困难的。

而且，虽然对按照时间序列把握相关省厅（译者注：相当于中国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的运动开展状况来说，制作数据库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但生活改善运动的相关活动在行政机关看来是已经实现了预期目标的完成了的活动，相关文件已经废弃了，因此把在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保存着的当时的文件作为研究资料都是很困难的。作为其替代资料，我们选择了各地方政府发行的宣传杂志。

在平成大合并之前，各地方政府成为合并对象，它们开始刊行市町村志，纪念杂志等宣传杂志，这些资料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因为是宣传杂志的记事，所以只能从中确认各项事业的预告，报告等信息，是非常受限的，但可以判断出，其作为确认各地方政府运动实践的基础资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定期召开的研讨会上，我们通过研究会成员调查内容的报告，评价等，开始不断修补数据库的内容，背景等。

同时，研究团队中也有意见指出，除了数据库工作，对当时参加各项活动的人进行采访也是一项紧迫的课题。这时，一直以立川市砂川地区为对象调查生活改善运动的增田昭子为作者介绍了从青年时代就在青年团的活动中负责生活改善运动的丰泉喜一（生于昭和5年[1930]），因此作者得到了断断续续对其进行采访的机会。据增田昭子收集复印的“昭和27年（1952）砂川村青年团事项 砂川村村委 教育部门”资料可以看到，丰泉氏昭和27年（1952）担任总务部庶务，昭和28年（1953）担任产业部部长，昭和31年（1956）担任青年团团长（昭和29年[1954]和昭和30年[1955]应该是逐级担任职务，但未能确认）。

丰泉喜一的话很令人意外。旧砂川村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情况与数据库对象地清濑市，国分寺市，调布市等完全不同。立川市砂川地区是近世初期开发的新田村落，其突出特征是在旱田上栽培经济作物。旧砂川村所在的武藏野高地西部地区的地形是在古多摩川堆积的沙土层上又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垆姆质土壤，富于透水性，是保水性很低的缺水地带。据说由于是后开发的新田村落，所以只能在这种地方建村。据说，居住在这里的祖辈们考虑到江户是巨大的消费地，主要种植蔬菜等，而砂川地区则形成了栽培经济作物的传统。养蚕兴盛的时候，他们就种植桑苗插条，养蚕衰败时他们就转而种植地瓜，当时为了保存地瓜还挖掘了地窖，而现在这些地窖又转用于兴盛的土当归产业了。这些生产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堆积得厚厚的垆姆质土壤。砂川地区的人们从建村时开始就依靠着不需要水田耕作的经济作物维持生计，直至今日。

而且，大正11年（1922）这里建设了陆军第五连队机场，在机场旁边又建设了相关工厂群，当时就是城市化的农村，生产活动兴盛的同时，消费活动也很兴盛。昭和30年（1955）左右，这里已经改建了房屋，因此没有必要单独改善厨房。同年掀起的反对立川基地扩张运动也发展成为全体村民参加的反对运动，他们反对将本地一分为二的计划，作为生活改善运动核心的青年团和妇女会也参与策划了反对运动。丰泉喜一这一时期就处于青年团的中枢。这里虽然同属多摩地区，但由于日常生活中消费生活很兴盛，又有反对立川基地扩张的斗争，所以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从丰泉喜一那里获得的砂川地区生活改善运动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有机会认识到，制作数据库的主要资料是宣传杂志，如果单靠宣传杂志的记录，就无法把握区域固有的日常生活的类型，也无法从整体上检验生活改善运动在区域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宣传杂志等的记事记录了地方政府关于各种生活改善活动的通知，报告等，为了理解和这些活动相关的人们接受和对抗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是不可或缺的。对相关人员的采访现在处于半放弃状态，与丰泉喜一的相遇也使大家有机会重新认识采访的意义和必要性。而且，数据输入工作逐渐陷入了一个陷阱，即失去了本应该以个人生活史为基础资料的民俗学视角，这也使我们对数据库制作的真正的终点进行反思。

4 生活改善运动研究的课题与展望

从平成29年（2017）又开始了以“生活变化/生活改善/生活世界的民俗学研究——以日中韩为基轴的东亚比较”为题的研究。迄今为止，成城大学进行的数据库制作重心偏于东日本的事例，对此

种情况进行反思，这一研究又加入了福岡大学，以福岡大学为中心对西日本的事例进行数据库化。

同时，决定了首要任务是要积极采访调查生活改善运动的相关人员。作者本人也尝试对相关人员进行过采访，发现很多人已经故去或健康状态不佳，因此无法进行采访，所以处于半放弃的状态，但与丰泉喜一的相遇，使我感到采访调查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为了检验数据库化了的各种活动在当地实际发挥的作用，对生活改善运动的相关人员和其对象进行采访验证是必需的。虽然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变化是受政策影响产生的，但接受方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不同，其接受方法也是不同的。通过重新确认民俗学的初心是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事象为基础资料，我们相信，日本各地开展的生活改善运动的实际状况定会更加明晰。

另外，在理解日本生活改善运动发展状况方面，通过制作生活改善运动数据库，我们感到必须考虑昭和22年(1947)施行的民法的影响，它是各种活动实践的前提。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实施了民主化的政策，家族关系方面也按照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24条，依照个人尊严和男女平等的原则，家族理念从封建的家族制度转向婚姻家族制度。按照这一主旨，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治民法的家族法，现行的家族法成立起来。女性从嫁入既存的夫家，变为通过婚姻形成新的家庭。通过这一转变可以看出，之前家族永续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而修改民法成为瓦解旧的家族制度的契机，这一点和年轻人开始作为自由的个人接受生活改善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逐渐作为核心性的存在，实现了之后的经济高速成长期。这些事实通过被采访者的个人史，家族史应该也会逐渐变得明确。

结语

我们希望通过生活改善运动数据库的制作，阐明从战后民法的施行，经过经济高速成长期，直至创出当下的日常生活的过程。

同时，除了理解日本的通时性展开，讨论同时代日本周边地区开展的各种活动也非常有意义。在平成29年(2017)“生活变化/改善研究会”第1次研究会上，加贺谷真梨做了题为《冲绳生活改善普及事业的开展与接受》的报告，报告指出，琉球回归日本前琉球农林省实施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反映了夏威夷大学事业部的Genevieve Feagin的建议。夏威夷大学可能会保存着相关资料，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冲绳生活改善普及事业的开展，来验证潜在于日本本土生活改善运动深层的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政策的视点。

而且，作为本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够对东亚圈的生活变化/生活改善/生活世界的形成，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就能阐明各国同时代的共同特征，以及日本生活改善运动的独特特征等。

参考文献

-
- 大门正克，2012，《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评论社。
- 田中宣一编，2011，《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农山渔村文化协会。
- 丰泉喜一，2014，《砂川基地扩张反对斗争的光与影》，立川民俗会编《立川民俗》第19号。
- 宫崎光一，2014，《砂川的青年团运动》，立川民俗会编《立川民俗》第19号。

韩国的新村运动和生活变化

南 根祐

NAM Kun-Woo

翻译：庞建春

1. 新村运动和未启动的“现在学”

在战后的韩国民俗学史上，恐怕没有什么事件能比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冲击更大的了。因为，朴正熙军事政权所推动的现代化¹工程不仅仅是对农村社会的结构改造，而且也使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于以往一贯把乡间的村庄作为民俗的传承母体来重视的民俗学者而言，民俗实地调查现场的结构变动和生活变化，成为了必须重新质疑民俗学的生存和实践的重大局面。1972年，韩国的民俗学会²主办了“第一届全国民俗学大会”，会议以“民俗学的职责”和“文化遗产³的保存和传授”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理由与此不无关系。当时以民俗学会会长身份主持会议的任东权先生对会议的背景和旨趣做了如下说明。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如火如荼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漩涡中，老传统里传承下来的民俗资料正在不断湮灭。其中也有故意破坏的[指也存在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民俗资料的保存面临十分危急的状况，对此作为民俗学会理应作出某种发言。……讨论中出现的问题点将整理成学会意见，之后提交上去作为文化遗产政策的行政资料以供参考(民俗学会 1972:106)⁴。

上面引文划线部分里提到的“民俗资料的故意破坏”，指的是朴正熙政权打着破除迷信的名义，动员行政力量强行毁坏和拆除全国各个地方的长性和守郎堂⁵。这些举措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生活运动”和70年代初的“美化新村工程”试行过程中，由于恣行妄为，屡屡遭到村民们的反抗和抵制，最终内务部颁布“长性保护令”，要求特别保护长性(参见资料1, 2)。至于守郎堂，“[当局]接受了文化遗产专门委员们提出的要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的民俗，将其作为国民和谐中枢的建议，并做出了慎重的检讨”(《东亚日报》，1972年5月6日)，尽管这样，当时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像守郎堂这类供奉村庄守护神的祭堂“在全国有三分之二的数量遭到了破坏”(崔吉城 1974:40)。

在这个“民俗资料的保存面临危及存亡之秋”，讨论会的旨趣是针对“民俗学的职责”展开紧急研讨。简言之，就是再次斟酌和提升民俗的价值和意义等等，挑明抢救的必要性和保存的当为性，然后将这些讨论的结果整理出来，“作为文化遗产政策的行政资料，提交上去以供参考”。而作为对这一要旨的响应，在同一讨论会上，基层民族文化论基础上的民俗抢救保存论形成了大势。唯有黄溟江，金泰坤两位学者对这种以抢救为“民俗学的职责”的主张提出异议，这里先来看看后者发言的一段内容。



资料1：《“长柱”保护令》（《朝鲜日报》，1972年4月28日）



资料2：《长柱，守郎堂保护令》（《东亚日报》，1972年5月6日）

民俗濒临湮灭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民俗不是湮灭，而是变化。因此，当我们甚至连变化的过程也视为研究的对象时，民俗学的领域就是现在学的，这样不就获得了既具有当下性又具有现实性的基石和广阔平台吗？……依我看，民俗学应该做的是把民众生活自身，也就是围绕着民众的所有立体的生活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民俗学首先应该能鼓起勇气，从过去的概念中勇敢地蜕变出来，乃至作出修正……应该对民众展开更为积极的研究，我是这样看的（民俗学会1972:109-110）。

如同上面划线部分所言，民俗学应该从所谓“湮灭”的叙事和过去的残存文化研究中“勇敢地蜕变出来”，成为一门探究“民众生活自身”的“现在学”。金泰坤先生的这一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围绕韩国民俗学方法论举行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上反复提出⁶，对其学术史意义的评价可以参考拙稿（南根祐 2003），而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他强调的“现在学”是否得到了贯彻。从结论上看，这个主张使得力求通过局内emic视角来研究民众现实生活的方法论的转换黯然失色，当时的韩国民俗学对被新村运动漩涡吞没的村落共同体及其成员们的“现实”生活没有特别的关心。成为问题的长柱祭，守郎堂祭祀或者巫俗信仰等，被研究者本质化为“民俗文化遗产”或者“传统文化”，成为了对抗现代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桥头堡。研究者仅仅致力于搜集和保存那些原型的民族文化，而对于就在眼皮下的打造“新村”及其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却全然视而不见。

结果是民俗学的研究严重滞后，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是如何“以主体的”经验来经历新村运动这一急剧的社会变动过程，对于强制性的国家动员体制给农村社会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带来了怎样的重组，以及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们衣食住方面的生存方式，仪礼和惯习等日常的“立体生活”面貌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的质疑和研究实践都没有跟上，民俗学失去了微观透视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宝贵机会。韩国民俗学所面临的今昔危机，实际上不少表现为“没有主体的民俗研究”自找的结果（南根祐 2013:195-199）。虽然晚了，但这是我们需要用未启动的“现在学”来展开新村运动研究实践的理由。

因此，本文将论及有关新村运动日常和生活领域考察的近期研究成果，具体包括历史学的民众史或日常生活史研究，以及社会学领域中有关日常生活研究的几个新成果。因为，这些研究探讨有关新村运动在日常动员和生活支配方面的表现，把生活在村庄中的人们策划的各种反应和抵抗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民俗学的日常研究而言，这是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为了便于中国和日本读者的理解，下面先对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开展做一个简单的概观。接着，考察一下运动中的重点工程及其相

关生活变化的研究成果，包括住宅改良工程，“统一稻”增产工程和“家庭仪礼准则”的施行等三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思考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的可能性。

2. 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展开

1961年5月16日军事政变后上台的朴正熙打着“祖国现代化”的旗号，大肆推行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这种工业立国的不均衡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的退化和疲敝。很快，农民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和挫折感扩大，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离村向都”的脱农趋势加剧，原有的“与村野都”⁷投票倾向也发生了变化。1971年的总选结果就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变化。农村地区对执政的共和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连朴正熙也感觉到了就在此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上，金大中强劲势头的威胁，不得不接受执政党得票率锐减的严峻政治危机。

这一危机意识导致次年1972年，出台了厉行“10月维新”的越宪紧急措施和独裁体系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朴正熙政权正面应对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在野党为中心的强大反对势力的反抗，对于民众则以直接号召和动员的方式削弱反对势力，将长期集权的维新体制做正当化处理，扩大支持自己的基础（朴珍道，韩道铉 1999:43-46）。

新村运动就在这样的政治社会需求下开展起来，这是为了将农村再建为强大的政治堡垒，以此包围城市反抗势力（高源 2006a:186-187）而实施的农村社会开发工程，是一种霸权主义(hegemonie)的统治战略。

新村运动的开端一般会追溯到农村的“美化村庄工程”。1970年4月，在商讨应对霜冻灾害对策的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朴正熙提倡了这一工程。那个时候，共和党财政委员长，双龙水泥的代表金成坤提到水泥行业不景气的状况，请求政府给予支援。朴正熙作出指示，要求制定出解决水泥库存过剩的方案（李桓炳 2012:98-101）。当年秋天，内务部向全国所有的行政村每村无偿分发335袋水泥，村庄的数量大概达到3万5千个。可是，这些水泥并不是个别分配，而是有条件必须用在村庄公共工程上面。而且，还推出了作为示范的十大工程项目，比如拓宽进村道路，整修村前小河川，开挖公共水井，修建公共洗衣处等等，其中为了筛选和推动符合村庄实情的工程，也采取了村民“自主”决定的办法。

然而，上述十大工程大部分都是平时



照片1：庆尚北道清道郡新道1里入口处，新巨站和广场上的朴正熙铜像。

（1969年8月4日，朴正熙为了视察庆尚南道遭受水灾的地区，乘专用列车沿京釜线经过这里，看到整洁的村落和为了修复堤防挥汗如雨的村民们后，他在此站做了停留。车站的右边展示有当时朴正熙一行乘坐过的列车模型。摄于2017年10月。）



照片2：新巨站内景。

（1970年4月22日，应对霜冻灾害对策的地方长官会议上提出：“看看庆北清道这类的地方。同样是农村，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还有“如果全国农村都变得像新道1里一样，那就太好了！”以此提倡新村运动。摄于2017年10月。）

农村居民们迫切期待的。结果，“美化村庄工程”反响巨大，在大约1万6千个村庄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因此，内务部以第二个年度工程为名，在次年向每个“优秀村庄”追加了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提供给他们作为“基础建材”。接下来，原本局限于村庄环境改善的“美化村庄工程”被推广大，开始转向以增加农村收入和启发农民精神为内容的“新村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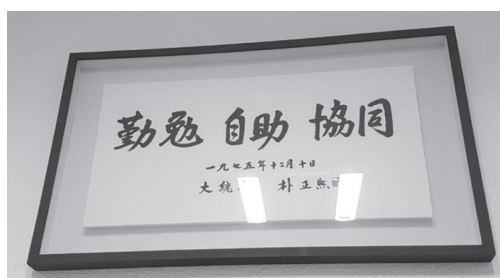


照片3：新道1里新村运动主题公园处修建的“新村运动发祥地纪念馆”（摄于2017年10月）。

通过相应不同的支援策略和升级制度，刺激和引导村庄间的竞争。朴正熙政权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抱负，最终要把所有的村庄都变成“自立村庄”。在此雄心壮志之下，他们将1971年到1973年定为“打造基础”阶段，1974年到1976年为“扩充生产基础设施”阶段，而1977年到1981年为“完善收入基础”阶段，面向全体国民提倡“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以此推动全国农村的“自立村庄”化进程（新村研究会 1980:205-237）。

就这样，新村运动一开始把农村社会的宿愿事业⁸放在中心位置，以引导农民自发参与的方式开展运动。但是，1972年10月维新体制成立后，这一运动逐渐从开发农村社会的性质向政治性的国民运动性质转变。次年11月在第一届全国新村领导大会上，朴正熙的一句总结就是不争的雄辩，即“新村运动就是十月维新，十月维新就是新村运动”这一宣言。结果，因为新村运动带有了强烈的官方主导的政治性质，随着工程的推进，反而越发丧失了初期的活力。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一工程的强制执行将农民们的不满推向高潮，批判的声音慢慢强烈起来。1979年10月，朴正熙的殒命终结了维新体系，与此同时，新村运动突然间失去了动力。

次年1972年，成立了由内务部长官和相关部门次官组成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充当推进机构。该会下面各道，市或郡，面等各级地方政府也成立了新村促进协议会，由道知事，郡守和面长分别担任委员长，各村组织村庄开发委员会，协助新村运动的领导。由此，新村运动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再延伸至末端村庄的等级化的推进体系，井然有序。同时，根据村民的参与度和工程的实际业绩，全国所有村庄被划分为“基础村庄”，“自助村庄”和“自立村庄”三个类别，



照片4：新村运动发祥地纪念馆2层悬挂的朴正熙手迹“勤勉，自助，协同”（摄于2017年10月）。

3. 住宅改良工程和生活环境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新村运动对韩国农村社会造成的影响，难以尽数言表，可以说达到了“无物无事不新村”的程度，几乎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卷入了打造新村的时代。从唤醒早市的钟声，到每天响彻全国所有村庄的“新村运动歌”，可以说都是这一时局带有象征性的表现。由朴正熙作词的运动歌中唱道了“推倒草屋，拓宽村路”，而正如歌词所言，新村运动的早期工程把重心放在了改善村庄环境上面。比如拓宽村庄里面的道路和农用道路，整修小河川和下水道，设置公共堆肥场，营造村庄林

(village grove), 改良住房, 普及电气和安装简易供水设施, 以及改善村庄结构等工程。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让农村景观和居住生活焕然一新的住宅改良工程。这一工程分两个阶段展开, 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侧重改良“草屋”, 另一个是70年代中后半期推动新建都市型洋房。首先, 前者主要是对屋顶和厨房的改良。受篇幅限制, 这里仅谈改良屋顶的情况, 主要方案是把稻草杆编的老式屋顶换成石棉瓦, 或者白铁, 青瓦的屋顶。这样做可以节省铺设“草屋”屋顶的劳力费用, 而且稻草杆可以用于做稻草绳等藁工用的材料, 以及用作燃料或者用于堆肥。但是对于农家来说, 改良实在是一笔大费用, 接受起来并不容易。因此, 政府在给予一些经济支援的同时, 也动用了强制性的



资料3:改良草屋屋顶的劳作现场(全罗北道扶安, 1972年), 转引自国家记录院 <http://www.archives.go.kr>



资料4:石棉瓦屋顶(《NEWSIS》,2011年5月25日, 引自报道“石棉瓦建筑物”)。

行政力量, 着手推行屋顶改良工程。结果, 从1972年到1978年, 总共有260万栋住房的屋顶实现了改良, 村庄中的“草屋”在全国范围内消失殆尽。毋庸置疑, 作为将“贫困落后的农村”摇身一变为“有经济实力的近代化农村”的先导工程(新村研究会 1980:483-485), 朴正熙政权积极而主动地利用了这一可视效果。

那么, 对于上述屋顶改良工程, 村民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这里值得关注一下李升勋从“日常生活视角”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根据他的研究, 一开始不认可屋顶改良必要性的村民人数很多, 但是, 想法慢慢发生了改变, 觉得真“换了以后, 看上去还不赖”。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不是没有牢骚和抱怨的声音, 也不是没有出现批判的言行。但这些杂音与其说是从根本上反对整个工程, 不如说是对强制性的促进方式表示不满, 抱怨住房建材品质不良, 施工掺杂水分, 不满“不必要的”屋顶改良等带来的经济负担, 反感“冬冷夏热”的石棉瓦屋顶和白铁屋顶(李升勋 2006:244-247)。特别是一些地方公务员们的不良行径, 比如肆意爬上别人家草屋的屋顶, 用钩子拆毁屋顶等等, 这类不择手段地实施和推行屋顶改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 为了积累自己的业绩, 他们往往隐瞒下了村民们对这类强制行为或者过分督促的反感(李桓炳 2011:192-194)。

接下去, 政府以根本性地改善农村住宅为目标, 从1976年到1979年展开了上面提到的后一项工程, 即建造都市型洋房。根据政府提供的几个标准设计图, 四年间共建起了18万5千栋所谓“文化住宅”。这一数值在当时农村全部住宅中仅占7%, 但是其中采用的“标准住宅平面”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良型平面”的基干, 影响相当深远, 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今天韩国农村住宅的面貌。李升勋将老式住宅和文化住宅的差别归纳为以下三点。即, 从老式的单体小屋转变为复合型的住房形态; 传统的坐式生活部分立式化; 对旧式的外通廊空间作内部化处理, 使其成为连接各个房间的中介空间。这三点呈现的就是典型的都市型住宅的转变(李升勋 2006:247-250)。



照片5:左侧后面为瓦顶, 右侧前面为白铁屋顶(全罗北道淳昌, 摄于2017年6月)。



照片6：按照改良型平面图修建的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住宅（全罗北道淳昌，摄于2017年6月）



照片7：利用玻璃推拉门将外通廊空间作内部化处理（庆尚北道新道1里，摄于2017年10月）

然而，从政策层面来看，新农村住宅改良工程的推进成效不大。因为，诸如改革农民意识，增加收入，消除城乡差距，抑制离农现象等等政策目标，都没太实现。再加上，都市型文化住宅不太符合农村生活用具和生活方式的需要，由此引发的抱怨和不满不在少数。尽管如此，李升勋采访的村民几乎都评价说，这个工程是成功的。对于村民这类与政策目标完全不同的接受方式，李升勋试图从农民向往“都市型生活”的“夸大效果”中寻找答案。也就是说，农民对于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因被排斥而产生的疏落感，劣等感，以及对城市的憧憬等等，企图通过拥有都市型文化住宅所具有的一切象征性意象(image)来加以克服，这一欲望是植根于下面的动因。近年来，农村不断增多的“田间地头电梯公寓”（南根祐 2015:255）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一现象延伸发展出来的例子。李升勋提出，拥有文化住宅的主观成就感，是促成认定农村住宅改良工程成功的主要原因。

4. “统一稻”的记忆和接受中的地域差别

20世纪70年代当时，新村运动通常被称作“奔小康运动”。前面提到的新村运动歌中也有“加劲创收，打造富村”的歌词。实际上朝着“富村”方向努力的创收工程也以多种方式展开，统一稻增产政策可算是代表性的例子。所谓“统一稻”指的是农学家许文会在菲律宾国际稻作研究所培育成功的水稻新品种“统一”（IR667）及其后代品种。这是一种适应韩国水土开发出来的高产籼稻 Indica系列的品种，产量比韩国以往栽培的稻种有大幅度的提高，一时被称作“奇迹稻”。

朴正熙政权从1971年开始，发起政府机构总动员，快马加鞭地力促这一稻种的推广和高产。结果，统一稻的栽培逐年迅速增长，到1978年已经占整个水田面积的76%（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 1989:431）。与此同时，全韩国的大米产量也获得飞跃性的提高。1976年秋末，维新政府宣告主粮大米实现自给。次年，出于庆祝“绿色革命成就”，14年来首次允许用大米酿造马格利⁹。然而，统一



资料5：“高唱提前实现‘大米自给’的丰年歌：统一稻创历史新高3242万石”（《京乡新闻》，1975年11月12日）。

稻仍然带有籼稻的特性，无法博得长久以来喜爱黏性日本稻Japonica的韩国消费者的青睐。因为比什么都重要的是，籼稻的味道不好。统一稻的市场价格当然很低，所以不愿栽培的农民也多起来了。为此，政府出台了二重谷价和秋粮收购这类制度性措施，大力推进以统一稻为主的增产政策。尽管如此，从1978年到1980年，连续三年稻瘟病（rice blast）大规模流行，并且有霜冻灾害，损失惨重，农民们开始正式全面反击政府强制推行统一稻的政策。结果，接手维新体制的全斗焕新军事政权，为了摆脱这一反抗带来的政治负担，不得不废除统一稻增产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和后援之后，统一稻的栽培面积立马减少了一半，1992年中止秋粮收购后，统一稻则完全销声匿迹(金兑豪 2009)。



资料6：“绿色革命的中坚：稻种改良12年——从创造奇迹的‘统一’到令人叹息的‘鲁丰’”（《东亚日报》，1978年9月11日）。

就这样，统一稻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盛衰起伏，其间交织了不可计数的事件和故事，在经过近40年的岁月后，至今韩国人的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至少对于50岁以上农村出身的人而言，在那个增产体制动员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经历及记忆，根本无法忘怀。粗略整理一下“统一稻的故事”的话，根据对维新时代所持政治立场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把它作为解决春荒问题的“绿色革命”成功神话，另一类是把它当成维新政权恣意推进高压农政的灾难来记述。不过，金兑豪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这两类记忆共同忽视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统一稻在中部地方最终没能占领一席之地，相反，在南部地方则以非常快的速度得到推广，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后期栽培量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约占整个水稻栽培面积的20-30%）。这其实是上述成功神话或者农政灾难叙事都无法充分说明的。金兑豪透析了两种叙事所忽略的统一稻接受的地方差异，进而开始考察和关注“统一稻故事”对以后韩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下面简要整理一下他的主要观点。

统一稻在南部地区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稻种，但是在中部地区除了全盛期70年代后半期的两三年以外，和日稻系的代表稻种“秋晴”相比较而言，无疑处于劣势。那么，这个接受过程的地域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因为统一稻为籼稻系亚热带品种出身，对于季节寒冷温差变化大的韩半岛而言，栽培这一品种需要在“苗床保温”等方面投入更多的技术和劳力。因此相对而言，在春秋气温较高的南部地区，统一稻落户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气温不那么高的中部地区，普及统一稻就没那么顺利了。

重要性不亚于这类生态环境条件的是经济地理方面的因素。如前所述，韩国的消费者们不喜欢统一稻，因此生产出来的“统一米”和市场上的日稻系大米，后者通常称为“普通米”，相比较，交易价格明显偏低。这样一来，市场上统一稻陷入被淘汰的危机，政府为了引导统一稻的栽培便启动了秋粮收购制度。在收购秋粮时，采用了优先购入统一稻和提高收购等级等优惠措施。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后半期的秋粮收购中几乎全数都是统一稻。事实上，这和农民与国家签约栽培统一稻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这样的签约栽培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因为，如果除了秋粮收购以外还有别的有保障的买卖途径，那么就没有必要一定指望着政府的秋粮收购。比方说像韩半岛南部湖南地方这样的粮仓地，周边没有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日帝时期¹⁰以来，这里大米品质的评价相对较低，因此相比较于较远的市场而言，依靠眼前提供各种优待措施的国家行政机构，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合理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中部京畿道地区靠近首尔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并且已经享有高级米产地的名声，因此与其和抑制“普通稻”栽培的政府做交易，不如和给“秋晴”出高价的民间批发商做交易更有利。特别是到了7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级米的需求激增，部分大城市的粮食批发商采用了预购粮食等手段，提供比政府秋粮收购更为有利的条件，刺激了秋晴的栽培。统一稻在中部地区没能落脚，看起来这类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很大。

而上述统一稻接受上的地域差别当然也带来了记忆的差异。就京畿道而言，一言以概之就是，“虽然遭受了统一稻的煎熬，最终生存下来的仍然是顽强的秋晴”。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记忆在以后消费者选择大米时仍然有较大的影响。比方说，20世纪80年代韩国大城市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以他们中心，对普通米的需求迅猛攀升。这里的普通米当然首推秋晴。因为如前所述，秋晴特别在京畿道得以广泛栽培，消费者对普通米的青睐，延续为对京畿米持续而热烈的关注。

有意思的是，这股“京畿米热风”在80年代当时，并不是因为秋晴品种整体上优于其他品种而刮起来的，而是有关过去的近期记忆和遥远故事交织在一起后，意外产生的结果。这里所谓“近期记忆”当然和把统一稻推向前台的强制性增产体制，以及战胜这一体制的秋晴的生存有关。这里面讲述，尽管政府有各种各样的钳制手段，但是农民们执意要栽种秋晴的故事。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类故事本身就保证了秋晴优越品质的勋章。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利川和骊州，有以前出产贡用的“紫彩米”的老记录，又为之增添了光彩的一笔。这样，秋晴以“京畿米贡米”的名声落地生根，并迅速传播开来。1995年，韩国最早的品牌大米问世，这一贴上“国王米”标签的大米，就是京畿道利川出产的秋晴。这并非事出偶然。直到今天，秋晴及其改良品种“新秋晴”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大米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京畿米热风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南部的湖南米受欢迎程度则逐渐降低。城市的消费者们形成了“湖南米即统一米”的概念，这导致在统一米退出历史舞台后，湖南出产的大米在市场上，仍然无可奈何地无意间蒙受差评的损害。而事实上，废除高压农政的80年代以后，全罗道（湖南）是仅次于京畿道广泛栽培秋晴的地区。但是，出于对湖南米的偏见，湖南出产的秋晴得不到应有的价格。湖南的农民们到90年代初为止，还一直耕种统一稻的原因，应该结合这种湖南地方版的“统一稻的记忆”来认真加以理解。总而言之，统一稻在南部湖南粮仓地成为了一种相对安全的多产稻种。不过，湖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远离首尔这样的大城市，而且自朝鲜总督府产粮增产计划以来，湖南米的价值一直得不到认可。因此，湖南的农民们不得不依赖国家维持的秋粮收购框架，而不是依赖市场。结果，这一不得已的选择落下了所谓“湖南米=统一米”的偏见和制约。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现在大米市场上是以品牌而不是品种为中心重组的结果，这一品牌化的方向反映出了湖南米和京畿米互不相同的处境。首先对于前者而言，很少正面打出湖南产的旗号。或者尽量减少有关产地的信息，或者较多采用“天涯海角村”这类模糊而浪漫的表达。又或者引进“一见钟情ひとめぼれ”这类在日本已经获得成功的品种，以求靠品种的名声而不是产地取得品牌化的成功。湖南产的品牌大米中，位居市场高价的“一见钟情米”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与此比较起来，后者京畿米在引进名牌品种时，仍然强调京畿道出产。比如说，2007年问世的“农心越光¹¹米饭”，为了克服在方便米饭市场上后起的不利，公司使出杀手锏，大势打出“京畿道产越光米”的旗号。尽管广告引发了争议，但是这一产品凭借着“京畿道贡米”和“日本最高品质越光米”两股品牌实力，打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类统一稻的故事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维新政府农政的评价上。在统一稻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又过了一个时代的今天，追溯城市消费者对大米偏好的渊源可以得知，这些是和创收体制的动员以及记忆联系在一起。统一稻的记忆不仅仅是有关过去事情的政治立场所组成的材料，而且是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今天日常生活的活着的故事（金兑豪 2016）。

5. 家庭仪礼的改编和龟裂

新村运动始于1970年的“美化新村工程”，1972年维新体制确立以后，运动以下述三大工程为中心正式展开。它们是：农村的①环境改善工程，②创收工程和③农民精神启发事业。上面提及的住宅改良和统一稻增产分别属于①和②项的代表性政策，两者分别在改良农村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点众所周知。至今对于很多韩国人而言，新村运动和“朴正熙热”（丁海龟 1998:60-70）仍然被一同视为成功的“神话”¹²，这特别是有关这两者的强烈经验和鲜明记忆作用的结果。因为不可否认，正是两者强制性的高压推进消灭了农村“落后的草房”和春荒。

另一方面，和③有关的例子这里想举“家庭仪礼准则”。正如这个准则的名称所言，“家庭仪礼”指的就是冠婚丧祭。1969年，以简化其中的“婚丧祭”三大仪礼的程序和扫除虚假浮夸的繁文缛节为目的，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和颁布了“婚丧祭”的标准和形式，这就是家庭仪礼准则。一直以来，针对遵循这一准则的强制性规范和法规所进行的“家庭仪礼”改编，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例如，从政策论的角度，探讨家庭仪礼的实态，问题和改善方案等；从文化论的角度，分析整个准则旨趣决定的社会文化上的特征和意义体系；还有追究在准则约束下，家庭仪礼和社会仪式发生的变化。后者一般都会涉及到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即传统性的仪礼传承和国家法定规则管制之间的矛盾冲突格局（金时德 2001；吴在焕 2001；都民宰 2002）。相比之下，高源不只是探讨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而且将现代化内部发生的冲突对象化，这一视角很有意思。特别是他对家庭仪礼准则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反应的分析，值得关注（高源 2006b）。

根据高源的研究，首先对于知识分子们而言，家庭仪礼属于个人隐私，对于制定“准则”这种做法，他们持批评的态度，或者反感。当时，朴正熙通过三选修宪强行取得长期执政的权力，在这样的政局危机中，导致人们对于准则的戒备心增加，准则的制定被认为具有干涉或侵犯私生活的危险性。在这样的氛围里，关于以法律的形式还是准则的形式来制定家庭仪礼准则，执政的共和党在政策审议会上也展开了艰难的论辩。结果，因为少壮派议员的反对，最后权且以折中方式处理，即整个准则以实在法的形式规定下来，但是没有引入处罚条款。

而就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民众而言，即便是无可奈何地延续着旧有的冠婚丧祭的习俗，他们对于改善旧习的必要性，还是存在强烈的共鸣。这是因为，当时的普通民众在家庭仪礼上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再加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已经使得传统生活的面貌发生了蜕变。这里面也表明了，促成家庭仪礼准则的社会影响力占据绝对优势的背景因素，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成为了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萌芽诞生的“新式虚礼”。新闻报道中评价为社会“领导层不遵守的家庭仪礼”（《朝鲜日报》1969年4月18日），或者“应该在领导层中间加以强化的家庭仪礼准则”等等。传统的前现代性遗习影响下的繁文缛节的风潮得到削弱，但反过来，工业化中壮大起来的新上流阶层主导的，带有夸示消费性质的繁文缛节抬头，成为社会问题。1973年维新体制建立之后，家庭仪礼准则关联法的修订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在新修订的家庭仪礼相关法律和准则中，强化了禁止繁文缛节的事项，添加了如果违反将受到强制处罚的条款，这是最大的变化。当然，没有很好地得到遵守和执行，是朴正熙政权修订和强化家庭仪礼准则的理由，可是除此以外，前面提及的上流阶层夸示消费欲造成的越轨行为，则是主要原因。尽管如此，政府不仅严禁夸示消费风潮，还把强制执行的范围扩大到一般民众的生活，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这大概是，把对上流阶层繁文缛节的社会反感为杠杆，强化家庭仪礼准这一管制大众的手段，此规范社会。这无异于为了维护维新体制的永久执政结构而对社会实行高压强制。

然而，带有强制力的这一新家庭仪礼准则，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却没能发挥出实效。这是由于，家庭仪礼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处罚条款是一种偷巧的权宜之计，很容易失去效力。例如，禁止使用像

请牒状¹³ 或者讣告状之类的印刷品个别通知，而实际上发送带有亲密语气的信件，即所谓“自律书信”，还有口头联络，电话通知或者在报纸讣告栏上刊登消息等等，使规定变得可有可无。结果，和以前通过印刷品进行个别通知几乎一致，惯习得到了延续。更成问题的是，政府提出的违反家庭仪礼准则的基准，有很多不合理处。例如，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家庭仪礼准则的强制规定，那么深冬时节为远道而来的吊丧客提供一顿简单的饭食，这也是不可以的。从农村的人情世故来看，不得不违反这样的规定，因为这是为人之道。于是，家庭仪礼准则的强制推行，诱发了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如此一来，在实施的过程中，揭发违规事例的很多，而实际受到处罚的却很少见。结果，朴正熙政权打着抵制繁文缛节的旗号以整饬社会秩序的意图，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得以贯彻。

实际上，导致社会不调的温床，并不是修订法律中规定的禁止款项，而是没有受到禁令约束的夸示消费新潮流。举例来说，20世纪70年代，在高级酒店之类的豪华礼堂举行婚礼，这样的行为被放到了批判的砧板上。土地，私家车和高级公寓等，数以亿计的奢侈嫁妆的往来，此种结婚的潮流以上流社会为中心登场，之后逐渐向下面的阶层扩散开来。婚姻成了公开的资产交易手段，职业媒婆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另外，豪华版墓地也成为了一类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在坟墓内安装特殊冷冻设施的现象。与此相反，祭祀这类仪式则无论上下社会阶层都实行了精简，因为这里面没有夸示的诱因，于是朝着符合时代趋势的方向，进行了形式上的简化。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漩涡中，上流阶层的夸示消费风潮越来越盛，扩散到了普通民众阶层中去。对于上流阶层的文化形态，普通民众一方面表现出隔阂感和排斥感，另一方面又从羡慕和体面意识出发主动模仿。这样，上流阶层的消费风潮作为一种所谓的象征资本，其社会影响力得到了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属于上流阶层的人利用家庭仪礼在法律和准则上存在的不合理性和盲点，借口用法令遏制传统和惯习是不正当的，使得朴正熙政权的家庭仪礼准则失去了效力。当时非常反常的是，从与传统的冲突当中，去寻找家庭仪礼准则没能顺利施行的原因和背景，这一倾向异常强烈，而这类社会论调的过度流布又为其提供了后盾。

整理一下上面的论述，朴正熙政权打着一扫繁文缛节的名义，在1969年引入家庭仪礼准则，这为韩国社会家庭仪礼的转变带来了契机，当时仍然沿袭传统的家庭仪礼风俗，可以藉此转变为西式的新家庭仪礼。而这个新式家庭仪礼准则深深地介入了民众的私生活领域，是一种企图管制家庭日常仪礼的国家主义的尝试。不过尽管如此，这个做法早期还是从一般大众那里得到了共鸣和响应。然而，准则实施带来的社会管制，很快面临了双重反抗，一个是与普通民众简朴生活方式的冲突，另一个是上流阶层资本主义性质的夸示消费欲求的企图，在这两重反抗当中，准则失去了效力。特别是，工业化当中壮大起来的上流阶层，他们利用了维新政府和一般大众的冲突，消解了政权社会管制的效力，通过所谓“制造差别(distinction)”，采用阶层上升的期待感以及上层阶层文化同化这类表达法，建立起了重构家庭仪礼的象征资本。最终，家庭仪礼准则导致了传统婚丧祭礼文化的解体，在构建起现代化的日常性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也同时从现代性内部新的竞争者那里，经受了相当程度的变异和交融。这样的家庭仪礼准则展开过程，反映出的是一种反讽的现象，即在普通民众克勤克俭基础上，国家实现了压缩性成长的现代化，而发达后的国家却又遭遇了来自自身萌芽和培育成的阶层的打击和挫折。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强调发展的国家模式出现龟裂，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抵抗，就成为了韩国社会支配势力的新社会典范和支配性意识形态，家庭仪礼准则的展开过程也暗示出了这个接受得以实现的原因。

6. 新村运动和日常生活研究

到此为止, 本文以李升勋, 金兑豪和高源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中心, 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 新村运动给韩国人日常生活带来变化的一个方面。其中高源的日常生活研究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论明示出了几点, 特此说明如下。首先, 与其从公式化的意识形态角度去解释接近日常生活的社会, 不如尝试从生活在日常中的人们的主观认识角度去理解。这也是因为, 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基本上选择质的研究方法和微观的接近方法。不过, 如果说宏观结构的指标或者资料有助于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 那么日常生活研究也应该积极加以利用。同时, 日常生活研究应该把注意倾斜到个人主观经验过度特权化的方式。原因是, 如同研究纳粹时代日常生活的波伊克特D. Peukert所指出的(波伊克特 2003:10-11), 日常史研究不能彷徨于枝节问题和微观画面中, 为此日常史的展望应该具备有关生活世界构造复合性的概念, 应该保持矢志不渝面向目标的分析观点(高源 2006b:196-197)。

另一方面有关③的问题, 高源从所谓“霸权权力战略”的视角对新村运动进行的分析值得关注。他所分析的点是, “想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的日常欲望”和“从经济上动员农民, 同时要强化政权支持根基的国家强制力的作用”, 这两种互不相同的利害关系相接, 制造出了矛盾和渗透, 变容和挪用, 赞同和分裂等等, 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大众政治机制。在这一过程中, 新村运动是一种国家试图介入农民日常生活中特定生活规范的“农民生活的现代性规律化”运动。由此, 农民被称作“国民”, 这是一种朝向霸权主义的权力战略的转化(高源 2006a:178)。

这里重要的是, 在宏观上的“打造现代国民”上, 不是只有所谓上面的支配阵营通过赞成和说服赢得霸权, 下面的农民也在新村运动中采用故意拖延, 假装顺应, 以及牢骚和抱怨, 反击和抵抗等等各种各样的表情和行动, 来践行他们自身小小的“日常欲望”。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饶有意味的变化, 大概就是由这个宏观结构和微观实践的接轨开始的。再者, 两者的互动让以前“无所谓的日常生活”很快转换成了“变化的日常生活”。这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要对象化的“日常生活”不是“日复一日的生活”, 或者东亚自古以来广为使用的“风俗”这类常用的意义。而是“作为现代经验和生活重组的领域, 是新的现代性历史所展开的”时空(Harootunian 2000:69-70)。

最近, 新村运动研究者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视角”或者“日常生活研究的观点”, 正是指向这类政治性时空中所展开的, 主体的微观生活实践的研究。他们扬弃了历来主张的“能动性的国家和被动性的个人”这一新村运动论的大前提, 主张“结构的视角和日常生活各种事实之间不间断的对话”(李升勋 2006:237-238), 这是一种将“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相接轨的新村运动”(金荣美 2009:11)历史化的尝试。这一日常生活研究主要以历史学和社会学为主导, 对政府和舆论媒体制造出来的各种文件和材料等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讨, 不仅如此, 他们还到过去曾经展开新村运动的村庄进行实地田野作业。在这个过程中, 对新发现的农民们的笔记和日记进行分析研究, 同时采访新村运动的亲历者们, 这看上去和民俗学的实地研究没有大的区别。

有关这类日常生活研究的新观点, 尚局限于少数的研究者身上。再加上, 这些研究“优先分析国家对日常生活所造成影响”的立场非常强烈, 因此“没能进一步展开对日常生活自身的研究”(孔提郁 2008:4), 这种局限的存在也是事实。另外, 难得的采访资料停留在主要对文献资料的补充和完善, 这也是问题。更重要的是, 没有自觉意识到明确区分和再结构“体验的生平史”和“讲述的生平史”这类方法论(李熙英 2015:133-134), 而由此进行的资料化和解读的工作, 都存在巨大的问题, 但是, 近来这些以韩国民俗学原来置之不理的新村运动为对象, 展开新的日常生活的研究, 这令人想大加赞赏。庆幸的是, 明年2月, 韩国的实践民俗学会也拟定以“现代化和‘民俗’研究”为主题,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希望能推广和深化这次学术会议有关日常生活研究的成果。敬请期待。

注释

- 1 译注：韩文中一般表达为“近代化”。
- 2 1969年，韩国民俗学界以任东权为中心，结成了“韩国民俗学研究会”，同年12月创办并发行了学会刊物《韩国民俗学》。次年，研究会也更为“韩国民俗学会”，可是由于崔常寿已经在1954年主导创立了同名学会，因此不得不再改称“民俗学会”。以后，两个学会于2000年合并后，诞生了今天的“韩国民俗学会”。
- 3 译注：韩文中一般表达为“文化财”。
- 4 引文中[]内的内容和划线部分为笔者注，以下同此。
- 5 译注：“长性”和“守郎堂”是韩国农村两种有关村落保护的传统信仰事项。
- 6 金泰坤任所长的圆光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从1971年到1973年之间，主办了一系列主题研讨会，主题依次是“民俗学的现代的方向”，“民俗学的转换的课题”，“民俗学的对象”和“民俗学的方法”等等。这些成果集结起来出版发行了《韩国民俗学：原论的对话》一书（圆光大学出版局，1973年）。
- 7 译注：农村支持执政党，城市支持在野党。
- 8 译注：长久急切期待解决的问题。
- 9 译注：韩国传统米酒。
- 10 译注：指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占领朝鲜半岛时期（1910年~1945年）。
- 11 译注：“越光”原为日语“コシヒカリ(koshihikari)”。
- 12 根据1998年朝鲜日报社和韩国盖洛普公司共同舆论调查的结果，韩国50年历史上最大的成就中，新村运动位列榜首，接下来占据2-4位的依次是举办汉城奥运会，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和光州民主化运动。2008年，为迎接政府成立60周年，进行了同样的舆论调查，结果第一位仍然是新村运动。具体内容请参考《朝鲜日报》1998年7月15日的报道，以及2008年3月15日的报道。
- 13 译注：即请柬。

参考文献

- 崔吉城，1974，《对破除迷信的一个考察》，《韩国民俗学》7，首尔：民俗学会。
- 德特莱夫·波伊克特，2003，金学颐译，《纳粹时代的日常史：顺应，抵抗，种族主义》，首尔：盖马高原。
- 丁海龟，1998，《朴正熙热的表现和性质》，《超越朴正熙：对朴正熙及其时代的批判性研究》，首尔：绿林。
- 都民宰，2002，《社会变化中祭礼的诸问题》，《儒教思想研究》16，首尔：韩国儒教会。
- 高原，2006a，《朴正熙政权时期农村新村运动和“打造现代国民”》，《经济和社会》69，首尔：批判社会学会。
- ，2006b，《有关朴正熙政权时期家庭礼仪礼准则和现代化变异，交融的研究》，《谈论201》9-3，首尔：韩国社会历史学会。
-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编，1989，《韩国农政40年史》，首尔：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
- 金兑豪，2009，《“统一稻”和增产体制的盛衰：从科学技术史角度认识20世纪70年代“绿色革命”》，《历史和现实》74，首尔：韩国历史研究会。
- ，2016，《制造统一稻的记忆和“国王米”的历史》，《史林》57，首尔：首善史学会。
- 金荣美，2009，《他们的新村运动》，首尔：青史。
- 金时德，2001，《家庭礼仪准则对现行丧礼的影响》，《历史民俗学》12，首尔：韩国历史民俗学会。
- 孔提郁编，2008，《国家和日常生活：朴正熙时代》，首尔：Hanul Academy。
- 李桓炳，2011，《模范农民和模范村庄的成长以及农村新村运动》，成均馆大学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
- ，2012，《20世纪60年代的村庄开发和农村新村运动的早期发展成果》，《历史研究》23，首尔：历史学研究所。
- 李升勋，2006，《20世纪70年代农村住宅改良工程》，《精神文化研究》29-4，城南：韩国中央学研究院。
- 李熙英，2005，《社会学方法论下的生平史再结构：从行为理论的观点看理论的意义和方法论的原则》，《韩国社会学》39-3，首尔：韩国社会学会。
- 民俗学会编，1972，《民俗学全国大会讨论会》，《韩国民俗学》5，首尔：民俗学会。
- 南根祐，2003，《“民俗”的现代，脱现代的民俗学》，《韩国民俗学》38，首尔：韩国民俗学会。
- ，2013，《为谁，为何的“实用”？——对韩国民俗学实践性的再考量》，《民俗学研究》33，首尔：国立民俗博物馆。
- ，2015，《首尔高层集合住宅的发展和电梯公寓的坛坛罐罐》，《日常生活和文化》1，首尔：日常生活和文化研究会。
- 朴珍道，韩道铉，1999，《新村运动和维新体制：以朴正熙政权的农村新村运动为中心》，《历史批评》47，首尔：历史批评社。
- 吴在焕，2001，《韩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仪礼文化的变化》，《社会调查研究》，釜山：釜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 新村研究会编，1980，《新村运动10年史》，内务府。
- Harootunian, Harry 2000,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战后南予“无蚊蝇生活”活动的开展 ——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到宇和岛市石应

山中 健太
YAMANAKA Kennta
翻译：孙敏

序言

从保护生活，保护生命出发而开展的卫生改善活动，才是亟待解决的贴近生活的课题。因此人们积极努力，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历史上能显著看出这种改善的是战后的“无蚊蝇生活”活动。这一活动原本是以杜绝传染病的传染媒介鼠类昆虫为目的，在居民的规划参与下推进的环境卫生改善活动，但在积极推进此活动的地区，以这次环境卫生改善的成果为立足点，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生活改善活动。此外，示范地区的“无蚊蝇生活”活动在向其他地区波及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增加同样的活动，而是在研究出各个地区自身生活课题的基础上开展了与自身情况相符的各种活动。

那么，这种环境卫生改善活动是何种活动？它是以何种方法扩展开来的呢？本论文在这一意识的基础上，以“无蚊蝇生活”活动为例，尝试探究政策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1章 所谓“无蚊蝇生活”活动

1. 观察“无蚊蝇生活”活动

所谓“无蚊蝇生活”是以消灭传染病的传染媒介鼠类昆虫等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这一活动是在战后尽量由居民主导并以民主的形式展开的。

同时，此项活动并不单单作为环境卫生活动包含在公共卫生的范畴中，而且它也是与改善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其中还包含着教育性的因素。关于“无蚊蝇生活”活动，在昭和30年（1955年）代，桥本正巳和须川丰从公共卫生学的立场，支持其与生活改善之间的积极关系[桥本1955，柴田·须川·加藤1957]。

2. 历史过程

关于“无蚊蝇生活”活动的开展，桥本正巳，须川丰，关直美¹ [2009]从公共卫生学的视角，泽田类² [2015]从文化资源学的视角进行了论述，在这里，我想梳理一下他们的论述中共同的历史认识。

一直到二战前为止，为了消灭以昆虫为传染媒介的传染病，根据明治30年（1897）4月制定的传染病预防法，规定要设立卫生联合会。联合会在警察的监督下，进行消灭鼠类昆虫的活动。不过，由于鼠疫的流行，日本修改了传染病预防法，消灭鼠类卫生害虫成为了市町村义务。二战后，国

家介入的强制性组织被撤销，各市町村开展的卫生活动也一时间消退了。

战后的保健行政由GHQ主导，在都道府县的保健所配置环境卫生监督员，整備卫生班。昭和21年(1946)召开了“鼠类昆虫传染病预防讲习会”，根据盟军的指示，要求在卫生科设置消灭鼠类昆虫的管理责任者，在县市町村设置鼠类昆虫消灭班[野村，川端 1947，金原编 1946]。直至昭和24年(1949)，这项事业被赋予了5亿日元的辅助金预算。但是，昭和25年(1950)，传染病预防法被部分修改，这一辅助金也被中止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补充，以日本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为中心，居民开展了自主性的消灭鼠类昆虫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把积极开展活动的市町村指定为示范地区，活动一旦受到肯定，就进一步把活动推向县(译者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里的其他地区。自昭和27年(1952)左右开始，“无蚊蝇生活”这项活动作为示范地区的事业渐渐被人们所了解。

“无蚊蝇生活”活动作为示范地区的事业出发，基于昭和30年(1955)6月的内阁会议的决定³，制定了具体的三年计划，谋求有计划的普及，从而确立了作为国民运动的地位。但是，从昭和35年(1960)左右开始出现了居民主体性欠缺的趋向。这项活动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出现了偏离目标的乱撒药，以及活动组织的形式化。而且，由于铝制窗框和纱窗的普及，这一问题也逐渐变成了各个家庭面对解决的问题。

3. 南予地区的“无蚊蝇生活”活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爱媛县南予地区“无蚊蝇生活”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

此次作为事例介绍两个地区，一个是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另一个是宇和岛市石应。活动的大小暂且不论，其根本目标都是实现“无蚊蝇生活”。为什么会举这两个地区的例子呢？因为这两个地区的活动都是效仿前述的示范事业发展成长起来的。旧五十崎町的活动，以提供技术支持的形式与石应密切相关着。旧五十崎町以长崎县为范本，旧五十崎町与石应的关系也是模范与模仿的关联。

第2章 五十崎町环境卫生实践会的活动

1. 地区概要

喜多郡旧五十崎町(现内子町)位于爱媛县南部的南予地区的内陆部分，以西是大洲市，以北是内子町，以南是旧肱川町(现大洲市)，东南边与旧河边村(现大洲市)相邻。肱川的一个支流小田川自北向南流过五十崎町的中心地区。这里是纯农村地区，也是稻作地区。昭和29年(1954)，旧五十崎町，天神村，御被村合并成为五十崎町。下面的活动是以前这三个村子举行的活动。

2. 活动过程

接下来，我们从《改订五十崎町志》和《馆报五十崎町缩印版》的记述来追溯活动的详细情况。

昭和18年(1943)和昭和21年(1946)发生了两次集体性痢疾，特别是在昭和21年(1946)，患者总数达到了121人，其中13人死亡。而且，还把小学的讲堂设立为临时隔离病房。由于发生了这种非常事态，居民对卫生的关心度高涨。因此，昭和28年(1953)，邀请了同町出身的长崎医科大学教授藤本薰喜⁴博士，召开了长崎县环境卫生活动方面的讲演会。昭和29年(1954)，町长以及町长以下共七名干部考察了环境卫生先进地区长崎县⁵。之后的昭和30年(1955)，大洲保健所发布指定“卫生示范町”的通知⁶，包含刚才提到的考察团共40余名相关人员召开了“环境卫生研究会”，制定了环境卫生实践会的方针。昭和30年(1955)1月25日，成立了“五十崎町环境卫生实践会”⁷。该实践会的目的在于推进“创建健康，明亮，富裕的町”，把消灭鼠类昆虫作为町政的第一标语，并把每年30

万日元的环境卫生费列入町行政的预算。

3. 活动内容

首先,活动的方针有以下五点。第一,本项事业采用长崎模式,将重点放在设施的改善方面。第二,在设施的改善方面,首先是修建厕所和水渠,然后是配备垃圾焚化炉并改善堆肥舍,畜舍等,改善厨房,设置简易自来水管等,最后是进行营养方面的改善。第三,因此,以旧町村为单位要为每个地区指定三个地区作为示范地区。第四,所需经费要在昭和29年(1954)进行预算更正。第五,为了推进此项事业,要广聚人才成立全町性的组织。也就是说,提出要效仿藤本薰喜提出的长崎模式,而且重要的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设施改善,并整备基础设施。

作为具体的活动,厕所改造的重点是彻底密闭便池,隔断其与外部的通气;下水道方面,提倡V字型的沟渠,这样就很容易用少量的水实现彻底清扫,并无污水残留。

4. 事业的发展 and 评价

本来计划五年间实现全体1870户一户不剩全部实现厕所,水渠的改造,但实际上从昭和29年(1954)到昭和35年(1960)这7年间完成了1862户。此项事业贯彻了指导方针,水泥,石灰等材料的七成由町负担,三成由地区负担。由执行班长等对整个地区进行巡视,并基于改造计划估算所需材料的数量。估算出的材料不是交给个人,而是作为整个地区集体的材料倍加爱惜的使用。而改造计划以外的改造,全部由个人负担。劳动力方面,大家共同商定,以地区居民无偿服务,共同作业的方式进行,不允许个人作业,对活动中的组织力做出了严格要求。这一改造活动与其说是个人活动,不如说是作为町行政进行的。在共同作业的情况下,整个地区相互融合,变得团结一致起来。在推进环境卫生的同时,道路问题,边界问题等多年悬置的问题也通过各自的努力解决了,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特别是对防止青少年不良化有积极的作用。山羊的羊腰麻痹病也极度减少,牛的增肥情况,鸡的产卵率也上升了大约2成左右(表1, 2)。

	苍蝇					蚊子					跳蚤					老鼠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
一点也没有了	1	0	2	3	2	2	3	6	11	8	12	28	27	67	46	10	4	13	27	19
几乎没有了	16	13	14	43	30	30	25	32	87	60	29	16	14	59	41	18	18	14	50	34
减少了一半	21	21	21	63	44	12	17	8	37	26	2	5	4	11	8	13	10	7	30	21
减少约两成	2	6	6	14	9	1	4	1	6	4	0	2	1	3	2	3	7	5	15	16
基本持平	6	12	4	22	15	1	3	0	4	2	3	1	1	5	3	2	13	8	23	16
总计	46	52	47	145		46	52	47	145		46	52	47	145		46	52	47	145	

表1 鼠类昆虫的减少率(昭和30年(1955)8月1日)

	鸡的产卵率				牛的增肥情况				婴儿的发育				家族疾病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上村	上宿间	谷成内	合计
增加	9	6	8	23	2	12	6	20	4	6	3	13	5	2	1	8
不变	4	28	7	39	4	14	7	25	2	14	5	21	5	10	2	17
减少	0	2	1	3	2	0	0	2	0	1	0	1	0	20	15	35

表2 环境卫生的影响(昭和30年(1955)8月1日)

5. 后续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展开了全町的环境卫生事业，具体表现在：对春季大扫除惯例进行指导，实施一年四次的消毒活动，每月灭鼠，处理墓前的供花器皿，整理竹林，拍蝇，举行消灭蛆虫的竞技会，实施町营洒水等。这些努力深受好评，昭和31年(1956)这里作为环境卫生町获得爱媛报社奖，昭和32年(1957)作为环境卫生示范町受到了每日新闻社及厚生大臣的表彰。

此外，指导此次活动的藤本薰喜还在本町实施了营养改善。由此，整个町的生活改善被激活，在《馆报五十崎町缩印版》中也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措施。

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从环境卫生的改善到饮食生活的改善，再发展为生活改善普及事业的脉络。

6. 小结

昭和30年(1955)，这里由大洲保健所指定为“环境卫生示范地区”，从这一经过可以看出，这项活动逐渐发展为提升町的整体生活的形式。

此外，长崎医科大学的藤本薰喜参加此次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长崎，在昭和30年(1955)阁议决定开展“无蚊蝇生活”活动之前，昭和26年(1951)7月，以“示范卫生市町村建设事业”为名，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其契机为，当时正在开展消灭鼠类昆虫以消除痢疾等传染病的活动，昭和26年(1951)5月西冈竹次郎知事就职，为了执行长崎县建设“卫生长崎”的政策，发出了严正指示，要求消灭蚊子，苍蝇，老鼠，创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桥本 1955b]。也就是说，出身于旧五十崎町的藤本把他在长崎进行的实践活动引入到了旧五十崎町。

因此，此项活动不仅具有长崎模式的特点，即行政部门与当地居民之间有着强有力的组织关系，而且组织起来的活动和设施改造都是从整备基础设施开始的。在此基础上，组织引导当地居民。不过，单就昭和30年(1955)来说，其组织也并未在村落中得到彻底的贯彻。在《馆报五十崎町 第7号》⁸中记载的反思中也可以管窥到，其中有些部分是缺乏“协作精神”的。

第3章 宇和岛市石应的公民馆和地区卫生

1. 地域概要

宇和岛市石应位于市内西南部，是九岛对岸的半农半渔的村落，由观音，若宫，住吉，金比罗，和灵一区，和灵二区，邻护，白浦八个地区构成。村落从陡峭的山地面向大海向平地延伸，沿着海岸形成细长的形状。生业主要是渔业，珍珠养殖业，柑橘栽培业。昭和30年(1955)代，柑橘栽培还没有那么多，主要通过梯田来栽培小麦和红薯。渔业很兴盛，捕鱼方式主要是四手网和围网。昭和32年(1957)，人口情况是户数357户，人口1397人。

2. 活动过程

我们从《地区卫生的衍变》及幻灯片记录电影《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来记述一下活动过程。

昭和28年(1953)，随着石应公民馆的设置，青年团团团长此下七雄⁹被任命为公民馆的主事。关于有效利用公民馆，他对一个事实产生了疑问，即，公民馆并未成为与居民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协商场所。因此此下七雄开始呼吁居民关心本地生活，并收集居民关心的生活事项¹⁰。从昭和28年(1953)开始的地区巡视，就渐渐变成了包括妇女学习班，妇女会¹¹，青年团在内的地区集会¹²(照片1)了。

昭和30年(1955)末,在某次地区集会中出现了“排水沟太臭了”“都是苍蝇无法忍受”等话题。此下七雄主事将其作为地区的生活课题,获得了宇和岛市社会教育科,宇和岛市保健所等指导机关的协助,组织了领导研究会,作为公民馆的年度计划开始尝试着改善地区卫生。在妇女会的组织下,以公民馆为立足点召开了环境卫生技术讲习会。从地区集会之中产生了石应地区环境卫生协议会。但是,当地的男性中也有这样的意见,说“渔民在意苍蝇的话还能生活吗”。在这些反对声中,妇女会,青年团向自治会申请下水道整备的资金,并让其作出预算。



照片1 地区集会的场景

昭和31年(1956),石应自治会就地区卫生相关问题进行商议,以此为契机,决定对地区下水道整备资金做出预算。之后,自治会的干部前往喜多郡旧五十崎町考察,提高了对下水道改善必要性的认识。同年11月19日开始,作为初期工程先从一个地区开始,并依次展开,预定3月的节日(译者注,3月的节日指3月3日的女儿节)时竣工。但工程开始后,其他地区也接二连三地申请改造为混凝土,于是工程就变成了整个地区的下水道改造工程。

3. 活动内容

昭和30年(1955),在地区集会上大家提出“蚊子滋生让人烦恼”的问题,于是决定实施下水道清扫活动。可是,当时的下水道底面凹凸不平,即使清除了污水和垃圾,也会立刻又形成水坑,反复滋生蚊虫。因此,有人提出用混凝土来固定下水道底面。七个地区集会中的一个地区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开始了下水道的改造活动。30户的会员全身沾满污水,流着汗,垒起一块块石头,并浇灌上混凝土。妇女们的辛苦劳动也得到了青年团团员和一些男人的帮助。大家都说“昨天还是黑乎乎的臭水沟,今天就变成了反射着太阳光的水道”。之后的三个月里,地区协议会以公民馆为立脚点倾注全力,整个地区向这一地区学习,也分别进行了改造。

妇女学习班从保健所邀请了技师,举行环境卫生技术讲习会,自治会及青年团也参加进来。在地区集会中,他们和保健所在卫生教育方面进行合作,随着地区卫生基础地图的绘制,环境卫生的实际情况就在地区集会中逐渐呈现出来。

实践计划的资金筹集也是通过搜集地区集会的意见而决定的,即将每年妇女会主要预算来源红薯干的销售所得15000日元换成50袋水泥。这样,在地区集会的1年里,完成了对下水道的改造(照片2)。最初妇女会计划到3月3日女儿节时完成整个地区的工程,但从第2次作业开始,在全地区“除去臭水沟”的呼声不断高涨,由此产生了群策群力的下水道改造活动。总经费40万日元,妇女会的50袋水泥也增加到了300袋。



照片2 清理下水道的场景

4. 活动评价

宇和岛保健所卫生教育负责人稻叶峰雄评价说,石应地区的活动并不是政府指定实施的卫生示范地区和活动,而是居民将其作为生活课题完成的最好的实践。他还表示说,特别是公民馆培养出来的地区集会是这一活动真正的母体,这是最大的经验。

另外,在《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中,自治会长对访问该地区的社会教育科科长说:“想不弄脏

自己的手就除去村里的污秽是不可能的。以前，一说想干点什么村里的事，首先就是去拜托市里，拜托有能力的人，现在我们才明白，真正能依赖的其实是村子。首先是自己要行动起来。我们深切感受到，只要这样做了，别人就会追随过来。”由此可以看出，这次活动也发挥了改革思想意识的作用。

5. 后续

地区集会对居民来说也可以看作是生活合理化运动，下水道改造不过是其中一例。昭和33年(1958)，举行了生活合理化运动，首要问题便是生活电气化的问题。在4月的妇女学习班里，邀请了四国配电的工程师做为讲师，对洗衣机，电饭煲等厨房电气化的知识，购买手续等进行研究，紧接着3个月后，8台洗衣机和40个电饭煲等就引入到该地区的生活中。

生活合理化运动，如生活电气化，生活经济调查，农民簿记的记录等，总是需要进行意识改革。下水道的改造既是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的意识改革，也在推进生活的协同性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记录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昭和32年(1957)制作了地区卫生幻灯记录片《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因为对活动进行了记录，所以提升了居民的活动意识。受此启发，举办了“私语箱”的活动，每月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和悄悄话用铅笔写在小纸条上。这些意见发布和讨论后，由公民馆进行记录并总结。

6. 小结

此次活动的契机是从居民间的对话中选出来的生活课题。“无蚊蝇生活”大体上可以说是从防疫问题演变而来的，但是，石应的生活改造活动是率先从居民的集体讨论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是值得大写特写的。

而且，这项活动发展为下水道改造活动的背后，能够管窥到促进生活合理化运动的妇女会的协作。这项活动的原动力是主妇们。地区集会也是由主妇们举办的。公民馆也能承担此项活动的统率作用，但此下七雄主张公民馆是听取居民生活意见的场所，认为提供后方支援是公民馆的职责。市行政也并没有参与此项活动。

第4章 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到宇和岛市石应

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和宇和岛市石应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两处活动的契机，背景，组织结构等都全然不同。不过，宇和岛市石应的事例中，在下水道改造活动以何种方式具体推进方面，以旧五十崎町为技术模范进行了考察。简言之，这两项活动虽然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在技术要点上是共通的。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旧五十崎町与宇和岛市石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是，清除滋生蚊蝇的水坑，垃圾堆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消除蚊蝇的发生源是一大课题。旧五十崎町开展了彻底的灭蚊运动。遵照长崎模式，将下水道改成易于泄水的样子，厕所和垃圾场用混凝土改造，减少苍蝇靠近。另一方面，石应受海面上波浪的影响，海里的垃圾逆流而上进入下水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必须解决的。

那么，这两项活动的不同点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居民们的定位问题。旧五十崎町采取了以町行政为主体，居民参与的形式。但是，石应全部都依靠居民。这与指导者藤本薰喜和此下七雄两个人的立场有关。藤本薰喜是长崎医科大学的教授，他从专家的立场支持了旧五十崎町的活动。因此产生了着眼于行政的居民策划。活动的推行方式是，以町长为首产生指挥系统，而从居民中选出劳动力，虽然其形式是居民参与策划，但只能被吸收进行行政的组织范围内，居民的发言权是很低的。而此下

七雄的着眼点与居民相同，他发现生活课题，唤起居民注意，并促使专家与居民间，居民与居民间实现协动。以地区集会为中心轴，自治会配合协动，而行政部门只以辅助的形式发挥作用。与前述的旧五十崎相比，行政色彩非常少，决定权在于居民的意志。如果说旧五十崎町是自上而下型的话，石应就是自下而上型。

南予的这两个地区的改善活动，虽然以互相学习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在面对各自的课题具体实施时，分别选择了行政方法和民主方法。

总结

南予的“无蚊蝇生活”使长崎的环境卫生改善活动成为了示范。这是由藤本薰喜首先在旧五十崎町开展的。旧五十崎町采取了藤本薰喜的意见推进改善活动，昭和30年(1955)在大洲保健所的推荐下被指定为示范地区。

在同一时期，宇和岛市的石应并没有把“无蚊蝇生活”作为其改善计划，而是要把公民馆发展成为居民生活中的场所，从这种社会教育的意义出发，此下七雄召开了地区集会。在地区集会中，下水道的改善活动由居民提出并提上日程。

那么，这两个地区在战后开展的“无蚊蝇生活”活动中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在活动的前景方面，旧五十崎町与石应有很大的不同。由居民主导推进的石应，改善活动发展为生活合理化活动成为可能，而在设施改善方面由行政主导的旧五十崎町没能摆脱行政的指示范围。第二，是对生活课题的应对。因为旧五十崎町在性质上是按照行政计划进行的活动，虽然会取得一定的成绩，却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状况。而在这一方面，石应有灵活的想象力和应对力，从下水道的改善活动开始不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这两点来说，生活课题由谁主导，如何定位，并以何种方式推进解决，答案不同，其后续的展开就会完全不同。“无蚊蝇生活”活动发生在昭和30年(1955)，因为还处于发展阶段，在摸索尝试中会有试行错误，所以情况非常混乱。有的地区是二战前式的自上而下型，以某种强权推进活动，也有的地区是战后式的自下而上型，贯彻反映了居民的民主意见。即使活动意图是希望居民参与策划，但活动的方向也会被主体参与生活课题的姿态所左右。因此，即使技术相同，在方法策略方面也会看到不同。

综上所述，问题就在于，向模范学习时，主体是如何理解模范的。如果理解为行政，则虑行政之虑，如果理解为居民，则思居民所思，活动也因此产生不同。石应的居民认为生活课题是自己的事情，因此在地区内广泛交换意见，达成协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超越了行政的界限。而旧五十崎虽然依靠行政在形式上达成了一致，但没能深入贯彻到居民个体层面。

在环境卫生改善活动中，地区的生活课题必须明确化。居民自身必须认识到生活课题是自己的事情，并在地区内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协动化，只有这样活动才有意义。生活改善活动的推行状况，说到底取决于当地如何把生活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对待，如何通过不断的对话推进实践。

注释

- 1 译者注：音译，原文为“閔なおみ”。
- 2 译者注：音译，原文为“澤田るい”。
- 3 参阅：《资料一关于“无蚊蝇生活”实践运动》（《都市清扫》昭和30年第25号），《81亿日元预算推进 驱逐蚊蝇的运动》（《新闻月鉴》昭和30年第78号）。
- 4 昭和21年（1946）成为长崎医科大学教授，昭和42年（1972）退休，其间一直致力于卫生学，公共卫生学的教育和研究。从昭和29年（1954）开始致力于五十崎町的环境卫生指导，卫生思想的普及。引领了五十崎町的环境卫生示范事业（五十崎町志编撰委员会 1998）。
- 5 考察了长崎市立神町，长崎市东 hands 町，西被杵郡长浦村，被杵町4个地方。与旧五十崎町直接关联的是西被杵郡长浦村。为了预防传染病和消除寄生虫，改造了厕所，设置了尘埃焚烧炉，整备了藤本式下水道，可以看到，传染病全部消失，寄生虫大为减少（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 1990a）。
- 6 昭和30年（1955）1月12日大洲保健所所长向厚生负责人寄送了“关于爱媛县卫生示范地区的设置”的通牒，通牒的内容是，想把这里指定为“卫生示范地区”，但还是想知道町的意向（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 1990b）。
- 7 组织的执行机构包括会长（町长），副会长（助理），以下分为理事会（会议的决策机构），会计（经费），执行部，协作班4个部门。理事会有议会议长，副议长，秘书，厚生委员，教育委员，校长，公民馆馆长，妇女会会长，青年团团长，大久喜矿业所所长，学识经验者共计31名。执行部中的对策部设置厚生组长，作为办事人员有厚生负责人和公民馆主事（启蒙，宣传），他们为理事会制定计划。同样，执行部中的实行部设置厚生员长，由各区长担任实行分部部长。协作班中设置学校协作班，妇女会协作班，青年团协作班（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 1990b）。
- 8 对指定为示范地区6个月后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是在“合作精神”方面却依然很难实现（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 1990c）。
- 9 此下七雄于昭和4年（1929）在石应出生。为人能干，体贴细心，受到大家的爱戴。昭和28年（1953）石应公民馆创立，他担任第一代公民馆主事。
- 10 此下七雄主事认为，“我是在官员，是指导者之前，首先是一个百姓，一个村民”，“我是这个村子的人，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百姓，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开动脑筋吧。我不会模仿政府，上面的人，以及其他公民馆的主事们。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就在现场共同探讨。问题不是在村子外部而是应该在内部。”他认为公民馆不应该只是等待而应该积极地推动此项活动。
- 11 妇女会的入会原则是结了婚就要入会，但如果自己的婆婆在妇女会，儿媳妇就可以不必参与。妇女会在石应作为一个组织，被定位为宇和岛市的基层组织。妇女学习班是公民馆开设的讲座，许多妇女会的会员都会出席，没有固定的年龄限制。
- 12 地区集会是以前村落生活为母体而产生的妇女群体。始于昭和30年（1955）年末左右，从30人左右的集会开始通过实践逐渐成形。“集会的内容乍一看是闲聊，就像是聚在一起玩一样，但实际上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学习活动。”妇女们互相发表自己在生活方面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五十崎町中央公民馆编 1990 《馆报五十崎町缩印版》
- 五十崎町志编撰委员会编 1998 《改订五十崎町志》
- 宇和岛市教育委员会，宇和岛市石应公民馆 1957 幻灯片记录电影《改造臭水沟的公民馆》
- 石应公民馆 1958 《地区卫生之路——石应公民馆事业概说》
- 金原一郎编 1946 《传染病媒介鼠类昆虫的消灭指针》日本医学杂志有限公司
- 泽田类 2015 《战后日本“无蚊蝇生活”实践运动的展开——对教育电影《一百位朝气蓬勃的主妇》进行分析》《文化资源学》13
- 柴田等，须川丰，加藤陆奥夫 1957 《为了无蚊蝇运动》《厚生》12（4）
- 《新闻月鉴》1955 《以81亿日元预算推进 消灭蚊蝇运动》《新闻月鉴》（78）
- 须川丰 1954 《消灭蚊蝇吧——环境卫生立法的背景》《当代法令》130
- 关直美 2009 《战后日本的“无蚊蝇生活实践活动”——从居民参与和国际协作的视点》《国际保健医疗》24（1）
- 《都市清扫》1955 《资料 关于“无蚊蝇生活”实践运动》《都市清扫》25
- 野村健一·川端爱义 1947 《老鼠与卫生害虫》北隆馆
- 桥本正巳 1953 《走在无蚊蝇之町》《厚生》8（7）
- 桥本正巳 1955 《消灭蚊蝇与蚋》《国立公园》66
- 桥本正巳 1955 《建设无蚊蝇村庄》《农业世界》50（8）
- 桥本正巳 1955 《关于广岛，长崎两县的环境卫生活动——全县普及“无蚊蝇生活”运动的先驱》《日本公共卫生杂志》2（3）

百年尴尬——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¹

周星
ZHOU Xin

汉语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俗凡时，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或“吃喝拉撒睡”（上海话称“吃喝屙汰睡”）之类约定俗成的表述，这些词汇如实反映了人们对排泄，如厕和厕所问题的态度：通常漫不经心，但也承认它是日常生活回避不了的一部分。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的如厕行为和厕所状况一直被列国人士诟病，直到2010年代，这个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才终于出现了真正的转机。

除一些田野报告偶尔会有片断报道外，中国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截至目前对如厕，厕所，厕所革命及相关问题，几乎没有像样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概述当前在中国已经发生，局部地正在成为现实，眼下仍处于持续延展之中的厕所革命，并把它视为现代中国大规模“生活革命”的重要环节之一（周星 2017）。比起把排泄行为，排泄物及与厕所相关的问题视为“卫生”问题，本文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当代中国具有复杂的综合性背景的社会及文化问题。本文使用的几个概念：“厕所文化”，指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有关排泄物之处理和排泄行为之管理的规范与设施等；“厕所文明”指某一社会在约束和宣导排泄行为和处理排泄物方面达到的科技水平和社会治理高度；“厕所问题”指在当代中国围绕厕所而突显的诸多问题的总和；“厕所革命”指某一社会基于内在自发驱动或在外部刺激下，对其排泄行为管理，排泄物处理设施及相关系统进行大幅度改造的一系列举措的总和。显然，厕所革命内涵着人们如厕方式的改变，厕所文化的变迁以及厕所文明水准的提升，其指向是让所有人均能享有清洁，卫生，舒适，安全，有尊严，以及便捷的排泄环境。

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

不同文化的人们可能拥有不尽相同的如厕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对排泄物的管控和处置方式。以中国之大，厕所及有关的如厕行为方式和文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游牧，游猎，游耕的族群，往往不设厕所或没有固定厕所，这不说明他们对排泄行为没有规范或不卫生，只是说在其生存环境下，人畜粪尿通常不构成问题。西南一些经营山地农耕的少数民族，有拒绝使用人粪尿作肥料的例子，在他们看来，和汉人用人粪尿施肥相比，他们的土地比较干净。如和西方的冲水厕所相比，中国较多旱厕；具体到如厕方式，和西方人的坐式形成对照，东亚各国较多采用蹲式。不言而喻，中国各民族也和人类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促成其有关吃喝拉撒睡的文化规范，包括对排泄行为的自控，对排泄物的厌恶等等，事实上，人类所有社会均没有例外地需要掩饰人身体的此类自然属性（约翰·奥尼尔 2010:10；戴维·英格利斯 2010:31-

37)。

汉族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其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较多使用人和家畜的排泄物作为农作物的肥料，因此，人粪尿作为农家肥受到重视。在北方农村，农人有在冬闲季节，提着粪筐和粪铲，出门“拾粪”的传统。在河南省林县农村，冬天拾粪的一些老人，还把拾粪的经验编成小曲：“拾羊粪上山坡儿，人粪背脊晃儿；狗粪墙拐角儿；驴粪上下坡儿；牛粪到荒草滩儿”。各地农谚都有“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之类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乡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和农耕文明形态适应的厕所文化，除了“堆肥”，收集人粪尿并视之为珍贵资源等内涵之外，确实也有视之为寻常之事，即便它有些脏臭，一般也不觉得那有多么难堪或多么难以接受。这可以说是中国最为一般和传统的“厕所文化”。

厕所在中国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说文》：“厠，清也”，其反训之义为言污秽当清除之。秦汉时代的“溷”和“圊”字，有猪圈和厕所的两重含义，在出土的汉晋文物中有猪圈，厕所功能兼备，厕所与牲口圈栏合为一体的泥塑明器模型。这种形态的厕所在中国的北方，华南及日本冲绳等地，一直延续至近代。尽管有研究者热衷于讲述汉代厕所已重视隐私并有通风设计，唐朝设“司厠”官职，宋朝时汴梁已出现公厕并有专人管理，清朝嘉庆年间还出现了收费厕所等故事，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截至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现状依然是露天旱厕居多，使用人粪尿做肥料依然寻常可见。

美国社会学者葛学溥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他指出，凤凰村的人们“有限的卫生知识基于传统和迷信而非科学事实”，即便在较干净的房间，也随处可见垃圾，污水和一桶桶没盖的粪便；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人们在同一条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2006:53-54)。

杨懋春在对山东省台头村的民族志描述中，较多涉及到厕所及相关问题。“露天厕所对农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胁。夏天厕所招来苍蝇，由于没有适当的办法把食物遮起来，苍蝇会再飞到食物上”。因此，“台头村的农民——其他许多村子的农民也这样——坚持所有饮用水都要煮沸，所有食物都要烧熟”(杨懋春 2001:42-43)。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各地乡村绝非罕见。

许烺光曾于1942年在中国滇西北一个处于霍乱爆发危难之中的村镇(西城)，深入观察了当地旨在净化社区污染的打醮等仪式。他敏锐地指出，人们在面对疫病危机时采取的是宗教净化仪式和实际的清洁卫生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既包括投放预防霍乱的药物，药方，也包括规劝民众遵从道德劝戒。例如，当地警方有告示称：“严禁放养各类动物。严禁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违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也有社区长者的劝告：“祈祷，禁欲，严禁污秽不堪”。人们把当地教会学校和医院在其厕所内外使用石灰粉消毒的方法(这种情形在1994-1996年代的中国颇为普遍)，引申到用石灰粉在住宅门前画出半圆形的线以抵御病魔的新尝试。通常，人们是不打扫街道的，就连自家门前也不清扫，但非常时期，却也能够接受包括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之类的公共道德劝戒(许烺光 1997:35-43)。

在东亚各国近现代之前的京都，江户，汉城和开封，北京，广州等人口较多的都城，都曾有过城里居民的粪尿为周边农村所需求，郊区农民通过各种方法把城里人的排泄物拉回来做肥料的情形。日本是在二战结束后，1950年代，逐渐增多的化肥使人粪尿失去经济价值；1960年代，各地开始建立粪尿处理站，实行化学处理；1970-1980年代，下水道和水洗厕所遂逐渐普及开来(阿南透 2010: 405-421)。在中国，以北京为例，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才最终淘汰了“掏粪工”这一职业。

在江南水乡，直至不久前，曾普遍有以室内马桶作为便溺之器的习俗。早晨，主妇到小溪涮马桶，然后，把马桶晾晒在门口。马桶里的秽物一般直接倒进河溪里，对公共卫生有很大妨碍。现在，由于卫生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即便在乡下，民宅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式抽水马桶，于是，传统的马桶就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它作为民间婚礼中的“子孙桶”仍是必不可少的陪嫁物。马桶在婚礼上当作生殖象征的隐喻，说明民间乡俗并不以为“秽”。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虽也有“厕神”的存在，但

她却不管厕所，更不管厕所卫生，其职能主要是“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

文明形态转换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诟病

有理由将中国饱受列国人士诟病的“厕所问题”，理解为是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朝工业文明，从乡土社会朝都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传统的“厕所文化”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但经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新文明形态，亦即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导致中国出现文明形态的转换。正是在这个转换进程中，厕所在所难免地成为严重和深刻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化肥工业迅速崛起，各种形态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一起大举进入乡村，不断弱化着农户对有机肥的依赖。

在中国农村，乡民们以农家肥料为依托，对化肥的进入半推半就，就短期效果而言，农家有机肥无法与化肥竞争，但各地流行的说法是化肥导致土地板结，需用有机肥去予以缓解，于是，就在化肥和有机肥之间形成相互参合的格局。与此同时，城镇和郊区农村之间曾经的人粪尿市场供需关系，很快发生变化。北京大约到1970-1980年代中期，郊区农村就不再需求，城里的排泄物必须全部由城市下水系统去处理。由于农村无法和城市一样在下水处理系统方面获得进步，因此，城乡差别在厕所和排泄物处理方面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拓展，厕所问题越来越突出。都市化带来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人口剧增导致人粪尿处理日益成为市政头疼的大问题；中国城市独特的流动人口，使得原本就已非常严峻的“公厕”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与日俱增，使有限的“公厕”完全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同时由于城市管理水平有限，“公厕”卫生状况陷入难以描述的状态。

如此的“厕所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发展”的阶段，具有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总问题之一环的复杂属性，还同时涉及中国社会特有的结构，如城乡二元结构等更深层的根源。当代中国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们一般需要两类设施，一是家庭居室内卫生间配备的冲水马桶，二是外出时需要的公共厕所，两种设施都需要有完备的下水排放或污物处理系统。现实的情形是实际使用公共厕所的人，往往就是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如同居民，尚无稳定居所的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者等。媒体和一般公众对城市公共厕所卫生状况的指责，和对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为的指责存在重叠关系，相对较少地指向于城市公共厕所的管理缺失。常见的解释是，在社会过渡转型期，人们的观念和(排泄)行为滞后于都市社会文明生活方式的要求。显然，和“私厕”(家厕)相比，“公厕”问题在中国有更为复杂的内涵(仲富兰 1990:201-208)。

当代中国的“厕所问题”，内涵着多层面的级差状态。它可能以城市对外地人或乡下人的拒斥表象出来，例如，大量的都市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往往回避向公众开放的义务；它同时也是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进而成为歧视和优越感建构的依据。更为大声地批评中国“厕所问题”的，还有列国来华人士及相关媒体。

1978年改革开放，海外观光客蜂涌而至，生活在现代都市或工业化社会的游客来到仍旧是农业国家的中国，从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遭遇“厕所问题”或对中国厕所所有惊人“发现”，感到严重不适，并不奇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厕所屡屡成为外国记者的题材，据统计，截至19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报道文章数以万计²。虽然这些批评让中国读者汗颜，官方的《参考消息》依持续不断地做了很多翻译和介绍。这些批评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改良厕所的努力。较早的努力是在全国所有旅游景点，旅游线路，

逐步设立相对较为体面的厕所，并对厕所进行评级。一个时期内，整个旅游系统的工作就是引导游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旅行，减少他们接触普通民众使用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厕所。

自上而下的厕所改良运动

由于厕所问题涉及中国政治精英看重的国家形象，因此，很多努力是自上而下的。1990年前后，借助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市组织了市容整洁行动，增建，改建公共厕所并开展了整治工作。1984-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1300多座，改建贯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共厕所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并使6000多座公共厕所初步实现水冲。状况虽有些微改善，但依然捉襟见肘。截至1993年底，北京市约有公共厕所5.7万座，但其中仅6800多座由环卫部门管理；70%的公共厕所分布在胡同小巷，而主要街道和繁华区仅有200余座。按当时的国家标准，北京90%的公共厕所都极为简陋，属于第四类。这些无隔挡的厕所，其实就是一排蹲坑，卫生状况非常糟糕³。

在上述背景下，1990年代初，首次在中国媒体出现了“公厕革命”的讨论。1994年4月，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⁴，连续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的公厕亟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评论，提出要开展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1994年7月，课题组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截至11月中旬，共收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和美国，澳大利亚的作品340多件；随后，还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获奖作品展，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厕革命”，对当时北京市民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随后，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基于同样的维护和展现国家形象及首都威望的逻辑，北京和上海屡屡展开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公共厕所问题事实上成为最具压力的考验⁵。

2004年11月17日，世界厕所第四届峰会在北京举行，这在中国是首次。当时，北京市规划到2008年，“城区”新建，改建二类以上标准公共厕所3700余座，所占比例达90%，逐渐取消三类及以下卫生设施不达标的公厕；“近郊”二类以上公厕的比例达60%；“郊区城镇”二类以上厕所的比例达30%。上海市的公厕短缺比北京略强一些，但同样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厕位失衡，市民“不文明”用厕行为等诸多问题，为此，上海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致力于增加投资和强化管理，探索厕所市场化运营的机制。北京和上海陆续建立了一批收费厕所，其设施比较齐全，并有专职保洁员。中国有许多城市都采用公厕“市场化”，通过收费维持经营管理，但程度不等地存在“重收费，轻管理”的现象。但有关公厕经营模式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免费）。

和“国家形象”类似的还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继有过一些具体的改厕实践，其中较著名的有2000年桂林市长李金早在桂林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2003年南京市长罗志军在南京倡导的公厕革命，以及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建设局长宿青平推动的临汾公厕革命等。2001年，国家旅游局在桂林召开“新世纪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以厕所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会上发表的《桂林共识》成为中国第一个关于推进“厕所革命”的共同宣言。《桂林共识》的基本内容是：没有旅游厕所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业的现代化。桂林旅游厕所革命的具体做法是“政府推动，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采取市场运作方式，在桂林城乡建设了849座旅游厕所，这使得城区和旅游景点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5.7座旅游厕所，远远高出国家标准。极大地改变了桂林市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环境，投资环境和市民生活环境。2000-2015年，桂林持续长达15年的努力，已经实现了旅游厕所的全域景点全覆盖，从而大幅度地改善了海内外游客的桂林印象。

2014年,李金早转任国家旅游局长,2015年初,国家旅游局开始在全国推动旅游厕所革命。李金早认为,旅游厕所虽小,却是游客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也直接关系着旅游产业,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⁶。2015年4月1日,习近平专门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政府部门的主导,“厕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文明工程。2015-2017年,国家旅游局推动的厕所革命迅速具备了全国性规模,较短时期内,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实施全国旅游厕所革命的意见》,修订《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提出“数量充足,卫生文明(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具体要求,希望用3年时间,通过政策指导,资金调配和标准规范等多种途径,力争到2017年在全国新建厕所3.3万座,改扩建厕所2.4万座,最终实现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行区的厕所全部达到三星级标准⁷。2016年2月15日,国家旅游局颁布《关于表扬2015年“厕所革命”先进市的决定》,对青岛等101个先进市(区)推进“厕所革命”的突出成绩予以表扬。这场厕所革命目前正由旅游景点景区,旅游线路沿途,进一步朝重点旅游城市扩展,并经由“全域旅游”概念的中介,进一步向全国基层蔓延,成为自上而下,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乡村的“改厕”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的厕所改良,其实可上溯至民国时期。当时除“平民教育协会”及一些大学知识分子的努力外,1928-1937年间的上海市卫生运动大会(鵬善民2007:135-140)和1930年代由蒋介石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也值得一提。前者是地方性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街道清洁(不随地便溺,吐痰,不乱扔垃圾诸类);后者则是全国性的,目的是想制造出全新的国民,两者都是由政府主导,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新生活运动试图将传统的道德(“礼义廉耻”)与一般人民的“食衣住行”相结合,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对普通国民生活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运动提出的“新生活须知”对“清洁”较为重视,包括保持厕所卫生,不随地小便等具体要求。其在江西省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确定了“公共厕所改造办法”;对一些项目的落实情况实施检查时,也涉及到公共厕所和屋内厕所的清洁问题,并敦促不达标者整改(深町英夫 2013:5,111,138;段瑞聪 2006:161)。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动的很多旨在提高国民卫生科学素养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工作,往往程度不等地和厕所改良有关。1950-7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灭四害”(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运动,治理血吸虫病的工作等,便是如此。爱国卫生运动有“两管五改”的提法,亦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1990年代,农村改厕被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央政府《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同时伴随着卫生乡镇县城的创建,农村也逐渐掀起了“厕所革命”。2002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农村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整治环境卫生,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促进文明村镇建设。2009年,政府将农村改厕纳入深化“医改”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0年,启动了以农村改厕为重点的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促使农村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迅速提升。2004-2013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82.7亿元以改造农村厕所,并实际改造2103万农户的厕所;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1993年的7.5%提高到2013年底的74.1%。根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年)》的目标,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15年达到75%,2020年达到85%。

2014年10月17日,全国爱卫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召开全国农村改厕工作现场推进会,会议认为农村改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2014年11

月5日，全国爱卫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的通知”。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表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农村调研时进一步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因此，近年来各地农村的改厕（推广沼气厕所，改旱厕为抽水马桶等）时有进展的报道，每每见诸媒体。

江苏省的农村改厕被认为在全国具有典型性。2005年之前主要是试点，通过建设“改厕普及村”作为典型，再以点带面，全面推进。2006-2013年，江苏省逐年加大改厕资金投入，累计达56亿元。截至2013年底，全省累计改建农户卫生厕所822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6%提高到94%，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已达82%。改厕的成功使江苏农村的寄生虫病感染率和肠道类传染病的发病率，自2006年以来，分别下降51.8%和36.7%。实施改厕工作，通常是卫生计生部门，爱卫办主导，农林部门负责沼气池建设，住建部门负责农村新（翻）建住房配套无害化厕所。具体做法是在村里先做好几家改厕示范户，组织群众观摩，激发农户改厕的动机；同时也编印技术手册免费发放，培训改厕技术人员等。除了三格式，双瓮漏斗式，沼气式等粪尿处理模式，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则推广污水的相对集中处理。例如，在苏南一些人口相对密集的村庄，建设相对集中的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一些重点集镇，则在乡镇卫生院及公路沿线加油站等建设无害化公厕等等。国家对农村家庭卫生厕所的定义是，有墙壁，屋顶和门窗，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既可以是抽水厕所，也可以是旱厕，但必须设置地下沼气池，以便对粪便做无害化处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被要求彻底改造农村的未达标厕所，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也分别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沼气厕所式样，例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的“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棚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厕所等等。这些样式大同小异，均以对排泄物的就地无害化处理为基本功能。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力主导和资金投入，举凡同意新建或改建卫生厕所的农户，均可得到一定的现金资助和技术指导，因此，农村改厕的进展较为顺利。

陕西省属于西北较为缺水干旱的地区，乡村厕所以旱厕为主，农村改厕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⁸。全省农户总数约711万，截至2015年年底，完成了366万农户的厕所改造，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达到52%。截至目前改厕已经使得肠道传染病发病率由2010年的30.25/10万下降到2014年的19.50/10万，但总体而言，陕西农村的改厕进程仍关中，陕北等地建设一座双瓮漏斗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2000元，在陕南建成一座三瓮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1800元，或建成一座三格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2800元。尽管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农户仍需承担相当的费用。由于《陕西省农村改厕工作“十三五”（2016—2020）规划》所承诺的改厕目标，仍是要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亦即2020年，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大85%以上，因此，省内各地各基层政府，均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商洛市丹凤县在陕西省属于欠发达的山区，总人口约32万。2006-2010年，该县在棣花，铁峪铺，竹林关等地开展了以修建沼气式厕所为主的农村改厕试点；2010年，丹凤被列为省市“中央重大公共卫生农村改厕项目”县。经多方努力，截至目前全县已改厕5.1万户，清洁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5%，乡村学校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7%。2017年7月，丹凤县获国家爱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正是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过程中，全县城乡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县城的公厕分布密度达3座/平方公里；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场，粪便无害化处理厂等运行良好，污水，垃圾和粪便处理均达国家标准。在农村，通过实施“改水，改厕，改灶，改圈”等工程，使广大乡民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2%；与此同时，90%的农户还用上了以电，沼气和太阳能为主的清洁能源⁹。丹凤县推进农村改厕的具体做法，除改厕资金专款专用，按时足额补助给项目农户外，还通过把改厕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小集镇建设”，“移民搬迁”，“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旅游开发等其他各类项目结合起来，多方争取为乡民改厕提供较多资金支持。不仅免费提供便器，瓷片，管道，水泥等建筑材料，还对改厕户给予适当的误工补助。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尊重乡民意愿，对原有旱厕进行改造或新建时实施一户一策，一厕一法，另一方面，又坚持卫生厕所有围墙，有厕顶，有密闭式贮粪池；无蝇，无蛆，无臭，无害化的“三有四无”技术标准。由于改厕使大批乡民获得了显在的实惠，眼下已经逐渐由“要我改”慢慢地发展成为“我要改”。

比较而言，旅游景区和大中城市的公厕改革，主要是强化管理和增加投资，农村改厕却始终面临着很多乡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行为的阻滞，其中最常见的是认为没有必要。改厕进展比较顺利的地方，往往是经济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村，乡民们对改厕高度认同，积极参加或配合，改厕工程也使村落环境发生良性巨变，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在一些乡村还形成了新的择偶标准，如果男方家没有卫生厕所，姑娘就不倾向于同意这门亲事。但毋庸讳言，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较为贫困地区和边远的山区，改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居住分散，改厕难以形成集中连片的效应，“没人，没钱，没观念”则被指出是农村改厕的三个难点¹⁰。农村过疏化，青壮劳动力多外出打工不在家，但改厕需要动土，也需要技术，留守老人们多倾向于拖着；还有不少农民认为花钱费工夫改造旱厕不值当，这就属于观念问题¹¹。类似的还有认为厕所本该就是脏的，拉撒的地方不需要那么讲究；或因为冲水厕所要支付水费而烦恼，或不大习惯沼气厕所一年两次的清理作业。

发展，卫生和文明：支撑厕所革命的“言说”

当前中国社会的厕所革命，实际是由几个彼此关联，但又性质不尽相同的“板块”所构成：1，都市化进程中居民家庭室内卫生间抽水马桶的普及，2，观光景点景区提升厕所服务的“旅游厕所革命”，3，作为市政公共设施需要强化投资和管理的“公厕革命”，4，农村以旱厕改良和建设无害化卫生沼气厕所为主的“改厕”运动，5，尚未真正展开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厕所向公众开放等等。

尽管不同“板块”的厕所革命各有特色，但中国社会的有关话语却大体上共享着一些颇为相同或类似的表述。首先是“发展”的话语，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延长线上理解和定位厕所革命的。农村改厕的目标，到2020年把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和卫生厕所普及率提升至85%，这既是国内政治话语体系，亦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参照或援引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亦即在2015年之前将人与粪便卫生地隔开的设施的全球普及率提高到75%，中国在这方面绝不能拖后腿。借助联合国的项目和理念推动中国乡村厕所改良的实践，是非常合理的决断。对中国而言，有关发展的诸多理念，比起直接借鉴西方国家，更乐意透过联合国有关机制来导入。事实上，中国农村的改厕既有国内爱国卫生运动的轨迹可寻，也有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倡的全球厕所革命予以积极响应的背景。中国政府在和西方国家就“人权”等议题发生争执时，往往把“发展权”视为人权的最基本内容，因此，在涉及“发展”问题时，也最乐意和联合国合作¹²。

环顾当今世界，厕所状况依然是区分“发达”和“不发达”最为清晰的标准，而长期以来的中国内地厕所，响亮而清楚地呈现出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身份。不仅如此，厕所革命同时也是国内的重大“发展”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面临严重的城乡发展差距，厕所环境可以说是城乡差距最为明显，直观和突出的表现，也因此，尽快改善农村厕所状况，彻底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缩小其和城市的距离，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农村幸福指数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数十年来的农村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厕却是进一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底线的重要举措。农村的厕所革命其实也是农村城镇化进程难以绕开的必由之路，只

有改厕成功，农民才能过上和城里人差不多同样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而言，旅游景点，景区的旅游厕所和城市街区的公共厕所固然重要，但在农村推广卫生厕所则更为重要。

中国厕所革命的第二套话语，是卫生科学的“言说”。尤其在农村，人畜排泄物的管理不善带来的卫生问题，被认为是必须改革的最大理由。长期以来，农村大约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的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由于厕所状况堪忧，人畜排泄物管理不善，上述状况一直难以彻底改变。在中国一般的农村，病原学，细菌学，防疫科学，流行病学等卫生科学基本知识的渗透依然非常有限。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或“眼不见为净”之类日常生活理念的乡民，依旧为数众多。直至21世纪初，在农村改厕运动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依然有在乡村开展卫生知识补课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改厕运动的卫生“言说”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其实一直是中国基层卫生防疫系统长期以来的工作用语。

城乡厕所革命共享的第三套话语是“文明”。厕所革命被说成是一项“国家文明工程”，其目的是要提升中国“厕所文明”的水准，这是公共媒体和政府的基本言说。这方面较通俗的表现，如“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很多地方男厕的便池前方写有“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都是这个意思。官方的基本表述如新华社的报道，引用了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的观点：“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厕所虽小，却是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是文明沟通中最短的直线，体现文明进化历程¹³。有关“文明”的言说，既有强调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也有强调个人层面的。前者把厕所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有媒体甚至指出，“厕所文明”欠缺的国家，难以进入世界文明之列。后者是把“厕所文明”说成是公民素养问题，认为厕所好坏既事关国家形象，又体现国民文明修养。例如，陕西省商洛市对“文明市民”的要求有“十不准”之说：1.不准随地吐痰；2.不准随地便溺；3.不准乱扔乱倒；4.不准乱贴乱画；5.不准乱堆乱挂；6.不准乱搭乱建；7.不准乱摆乱放；8.不准乱穿马路，闯红灯；9.不准损坏市政设施；10.不准损毁公共绿地和绿化设施等。类似这样，各个城市均在推动的相关规范，眼下正在日益形成如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的那种“外部强制”，一旦它们内化为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文明化的进程就会形成日趋严格及明确的走向（诺贝特·埃利亚斯 1998:251-252）。

但是，中国公共媒体和官方话语中还有另一套颇令国人自豪的“文明”言说，例如，中国是文明古国，数千年文明史一直没有中断，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等。但每逢奥运会，世博会和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形象时，上述两种关于文明的言说有时就会相互抵触。此文明非彼文明也，一是古代文明，一是现代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的辉煌并不能掩饰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厕所）文明缺失的尴尬。中国古代文明体系，在厕所及排泄问题上，除了予以优雅地迂回或忌讳地表述之外，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夸耀的遗产。中国自诩自古以来为“礼仪之邦”，但因传统文化一向视厕所为不齿，不屑，从而无法认真对待它。虽然让富于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依照西方的（厕所）文明标准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似乎有些别扭（罗斯·乔治 2009:119），但如今，厕所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形象的大问题，文明言说也成为国人自我激励以改变现状的动力。从中国传统的并不那么令人骄傲的厕所文化，经由厕所革命的洗礼，发展到现代的不再令国人尴尬的厕所文明，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或按照中国的说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捷径。

笔者认为，在述几种基本“言说”之外，厕所革命还特别与现代国家之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密切相关。作为市政工程体系的一部分，城市厕所和下水处理系统往往是社会公共体系中最基础的环节，城市的标准化公共厕所必须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显然，这样的“厕所文明”无法由个人单独建构，厕所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它必须是政府和社会公共体系的义务。政府与其抱怨市民的“方便”不够文明，不如检讨作为供给侧和管理侧的基本责任。在中国，厕所问题实际还是

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除了城乡差距，屡屡被指出的“内部厕所”恰好可以反映这一点。早在1994年，上海市就要求沿街单位的厕所对外开放；但在南京市，直到最近，仍有民政局办公大楼拒绝前来办事的市民使用其厕所的情形¹⁴，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因此，各地的厕所革命往往就内涵有敦促“内部厕所”向市民开放的内容。欠缺公共性的“内部厕所”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往往会以“内/外”区隔的逻辑突显出来。

注释

- 1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2017年8-9月在陕西省商洛市所做的相关调查，该调查得到和平中岛财团亚洲地域重点学术研究项目“日中韩·东亚的生活变化/生活改善运动的比较研究——旨在建构‘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平和中島財団アジア地域重点学术研究助成「日中韩・東アジアの生活变化/生活改善運動の比較研究—『日常学としての民俗学』構築のために」）的资助，谨此致谢！
- 2 参阅：姜晓琪：“我所亲历的‘所革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8月1日，第8版。
- 3 参阅：“中国‘厕所革命’的30年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2015年8月1日。
- 4 当时，笔者也曾经一度是该课题组的成员。
- 5 参阅：沈嘉：“世界厕所峰会在京开幕 京沪承诺厕所发展规划”，中国新闻网2004年11月17日。单金良，陶颖：“北京将每年新建改造400座公厕 男女空间4比6”，《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7日。
- 6 参阅：李金早：“旅游要发展，厕所要革命”，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015年3月19日。
- 7 参阅：钱春弦，沈阳：“我国今年将开展旅游厕所革命”，新华网2015年1月15日。
- 8 参阅：梁锦：“农村‘如厕’难？陕西将掀起一场‘旱厕’革命”，人民网，2015年11月20日。
- 9 参阅：刘春荣：“丹凤实施五大工程改善生态环境”，《商洛日报》2017年5月5日。
- 10 参阅：史林静：“中国农村的‘厕所革命’”，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7月27日。
- 11 参阅：葛欣鹏：“厕所革命，一场‘习惯’的较量”，半岛网·《半岛都市报》2015年8月19日。
- 12 参阅：刘莉莉：“世界厕所峰会代表称使用不洁厕所侵犯人权”，《新闻晨报》2007年11月5日。
- 13 参阅：钱春弦：“握紧‘文明尺度’，改造‘方便角落’——就‘旅游厕所革命’专访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新华网2015年3月18日。
- 14 参阅：“南京一民政大楼厕所装密码锁 回应称上厕所的太多”，中国广播网2014年11月6日。

参考文献

- 阿南透，2010，“民俗学视野中的消费”（赵晖译），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10月。
- 戴维·英格利斯，2010，《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段瑞聪，『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第161頁，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2006，《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 罗斯·乔治，2009，《厕所决定健康——粪便，公共卫生与人类世界》（吴文忠，李丹莉译），中信出版社。
- 诺贝特·埃利亚斯，1998，《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袁志英译），第二卷 社会变迁 文明论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鹏善民，2007，《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
- 深町英夫，2013，『身体を躰ける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運動』，第5頁，第111頁，第138頁，岩波書店。
- 许烺光，1997，《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王芃，徐隆德，余伯权译），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 杨懋春，2001，《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A Chinese Village—Taitou,Shangtung Province）》（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约翰·奥尼尔，2010，《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仲富兰，1990，《现代民俗流变》，上海三联书店。

周星，2017，“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我们以“生活”一词想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 ——对第一天诸发表的点评

田村 和彦
TAMURA Kazuhiko
翻译：宗晓莲

1. “生活”的前景：以1900年前后出版的汉英辞典/英汉辞典为例

“生活的变化”和“生活改善”是日本民俗学会主办的本次“没被在意的日常/不断变化的日常”国际研讨会的研讨主题，也是主题演讲，问题设定，以及今天各发表的共同关键词。这里所使用的“生活”一词，有着怎样的内涵，民俗学积极使用这一概念可能开拓什么样的可能性？为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今天各位的发表作一粗浅的评述，笔者打算以有点绕弯的方式，从简单整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的变化过程开始，笔者认为这样可以更清晰地凸现诸发表以及本次研讨会的特点¹。

岩本已经指出了在日本“生活”一词的来源，变迁，以及此后对其内涵进行的有目的的变更。在中国，该词即使在近现代也并不包含今天我们马上能联想到的内容（岩本 2009，2011）。笔者打算从整理这一差异出发，开始今天的述评。

首先让我们从将汉语翻译为其他语言开始变得非常必要的1900年前后的汉英/英汉辞典着手，考察这一问题。

根据1892年发行的著名《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其编者是后来成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学教授的Herbert Allen Giles，汉语的“生”有着to bear; to bring forth; to produce; to beget; to be born等含义，在这一意义上与“灭”“没”，及“死”“克”等词形成反义词。另外，“生”还有着raw, fresh; barbarous; unfamiliar, unacquainted with等含义，在这一意义上与“熟”形成反义词。此外，作为to be alive; living; life之意也通常使用，列举的具体事例有“生理，生活，生业，生涯”等词，其对应的英语则列举了occupation及livelihood等词，特别是作为“生活”之意时，也有to make a living的含义（Giles 1892（1912））²。该辞典在指出该词有着我们今天所用之意相近的含义的同时，从总体上来说，“为了生存的手段”的语感很强。

对近现代中国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5年发行了P.Poletti所著的《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该辞典以对一个个汉字进行解释说明为中心，基本上没有列举成语或惯用语的例子。其对“生”的解释是to produce; to bear; life; unripe; new; unpolished; raw; to arise, to grow; to beget，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生活”一词的life（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此前后出版的其他辞典的例文中，列举了“活着”一意）只是多项内含中的一项而已，在“生”所包含的多项含义中，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含义（Poletti 1905）。

上述辞典主要是欧美人用以参考的，下面来看看中国学者翻译的辞典。1929年出版的《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是由O.Z.Tsang（张鹏云）编纂的汉英辞典，张鹏云当

时在以有着“中国的哈佛大学”之称而著名，教会系大学之首，培养了众多知识分子的St. John's University任专职翻译教师。他所编纂的这一辞典中，“生活”一项被解释为“生活or生计or生涯”，其对应的英文则是living; livelihood; way of life; occupation (Tsang 1929)。乍看之下似乎包含了今天的“生活”一词相近的解释，然而如果用可以置换的词语进一步思考该词的含义，那么在“活着”，“生存”之外，“活下去的技能”，或者是作为其具体表现的职业才是该词的主要内含。该辞典中出现了“生活程度：the standard of living”，这一今天也使用的扩大了“生活”概念，然而从把biodynamics翻译为“生活机能学”可以看出，依然强调的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的“生活”，也就是说作为说明“活的”“活着”样子的概念。

下面让我们反过来看看，可能翻译为今天的“生活”一词的来自于英语的概念又是如何汉语化的，并看看相关事例。

上文中提到在解释“生活”一词中，有可以认为是与今天用法相近的life及living，在1905年出版《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中，是如此说明的(Hemeling 1916)：

Life被译为“性命，生，生命，命，活命，活着的时间，终身，一生，一辈子”，manner of living的翻译则有“过日子的方式，行为，举动，品性，世路，生平遭遇，力，气力，精力”。正如high life被译为“高等生活”；“生活，生机，生气”的对应词汇则是animation。在这一个项目中，与今天的“生活”一词最相近的译语应该是not a daily necessity of life的翻译“非民生日用所必需”的“民生”³。另外，作为standard of living的翻译语，使用的是“生活程度，生事程准，国民生计等级”等词语。有关这一翻译的学术背景，下文将论及陶孟和等人的研究。

相关词语也有着相似的翻译，livehood有“养廉，贍养，营生，生活之计，生计，养生之计，生涯”等词语与之相当，to get a livelihood被解释为“过日子，度日，糊口，生活，营生”，与其相似，living alive被解释为“活的，活着，活，生活”，living (livelihood)的含义则有“养廉，营生，生活之计，养生之计，生计，生涯”等。

该辞典也同样大致将“生活”解释为说明活着的状况，是与当时的“生理”及“生涯”同样范畴的词语，作为为了生存下去的收入，职业，及相关技术等含义而被使用的。

接着让我们以近年编纂的古语辞典为依据，检证一下1900年前后编纂的英语/汉语辞典中所收录的“生活”一词的内涵与今天该词的不一致之处。根据对古代汉语词汇进行解说的《现代汉语词典》，“生活”一词的含义有“工作，活计”及“物件，物品”，关于前者，列举了《独角牛》和《金瓶梅词话》中的用法，两者都是有关生计，生业的事例(许(主编) 1997)。以类似目的编纂的《汉字古今意合解字典》中，有关“生”的字义有“①成出，生长，②人的出生，生育，③产生，发生，④活着，生存，⑤生产，⑥生计，生活，⑦生命，⑧一生，终生”，第6个含义有“生活”，然而是与“生计”属于同一范畴的(许，陈 2002)。作为第7个含义的解说，该字典列举了《捕蛇者说》一文中“而乡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转徙，饑渴而顿踣”，句中的“生”为例来说明。然而如果论及今天“生活”一词的内涵，笔者则认为同文后半句“故为之说，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中的“人风”更为相近。

上文以1900年前后编纂的英汉辞典和有关汉语古词语的辞典为依据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可以看出当时“生活”一词的含义与今天有差异。至少可以说，是作为与《The Oxford Chinese Dictionary》(2010)记述的以“生活”开头的18个翻译词语(例如生活必需品daily necessities，生活方式way of life，生活条件living conditions，生活作风conduct等)很不同的含义被使用的。笔者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然而即使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外来语研究中极为著名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等 1958)一书，也忽略了该词。有可能是因为就在我们身边的“生活”过于理所当然，从而使得“生活”一词遭遇了这样的待遇。然而，这一点也正是笔者今天点评的立脚点。也就是说，我们是如何令此

概念发生变迁,某种意义上对此进行探索的,又是将什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的,对“生活”概念过于理所当然的接受,正印证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检讨的必要性。不过在经过以上的考证后,先让我们来看看“生活”概念用法的扩张,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2. “生活”概念的变迁

作为了解“生活”概念扩张,变迁的路径,这里以哈佛-燕京研究所所藏书的一本整理了中华民国时期书籍的资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龍 2010)为依据。

该书中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关系很深的“社会科学类”中记载的书籍中,含有“生活”一词的著作有33本。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对此进行排列,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倾向。

最早的1928年出版的《马来半岛土人的生活》,《中国妇女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今天的“生活”部分含义相近的用法。然而这样的用法很快消失,从1930年至1932年,《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等书出版。这一变化倾向应该与后文将述及的陶孟和等人著作的出版有关。这一时期使用的“生活”一词,受到欧美理论,社会实践的影响,“生活”原本内含的与“生计”之意相近,同时在数量上可以把握的一面被强调。然而,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强调新生活运动后,“社会科学类”中所有包含了“生活”一词的书籍都转变为与该政治运动相关的内容,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一运动受到了日本的“生活”概念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时期出版了,《农民的新生活》,《儿童的新生活》,《妇女的新生活》,《文艺家的新生活》等等,所有人都试图参与这一作为政治运动的新生活运动的样子可以想象。上述书籍的出版社是南京正中书局,再从著者或编者的履历来看,这里使用的“生活”一词正是新生活运动的生活概念,而不可能是其他含义。

同研究所藏书中,书名打头使用“生活”一词的,以1928年出版的生物学教科书《生活进化史ABC》为开端,1934年陶行知校订的《生活的书》(汪達之著)等作为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作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的重要书籍也出版了。然而,与新生活运动时期“社会科学类”书籍中包含“生活”一词的书籍急增不同,之后到1940年为止,总体出版量不多。到了40年代,1941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翻译出版(原著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阪本胜翻译为日语时,译为《生活の发现》(1952),现在的日语版标题为《人生いかに生きるか》)。从这一时期起,如何度过理想的人生的指南类书籍开始增多。燕京研究所藏书目录可以看到的林语堂的该书中文版是由黄嘉德译,西风社出版的,几乎是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中文版也出现了。有趣的是,虽然译者不同,但是在品味推敲Art的翻译词时,由于位处同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背景下,都采用了令人联想到周作人提倡的“生活之艺术”的《生活的艺术》这一译语。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生活”一词,是作为与“智慧”,“思想”,“体验”,“幸福”等连接的词语被普及的,此内含的深意可以推测为,上文1900年前后编纂的汉英辞典中的相关词语内涵的进一步发展,继续下去的“生存”,“生涯”更进一步扩展为“人生”,乃至如何以更理想的方式度过这一“人生”。以对林语堂产生过很大影响而闻名的民俗学者周作人早在1920年代就在这一意义上讨论了“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俗学比其他学科更早地具有了将该词作为学科的关键概念进行深入探究的条件,然而却错过了这一机会,这样说也并不为过。

3. “生活”和“社会调查”——作为改善对象的“生活”

点评的预备工作的最后，笔者还打算探讨一下中华民国时期出现的具有了新内含的“生活”，与此进行调查的视角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学中，首次系统的社会调查是1914年实施的《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也就是说，社会学的最早研究就已经将“生活”确立为对象。这一调查以基督教会大学为中心，当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学问而输入的社会学在大学相继开设，其指导者是社会学教员John S. Burgess，实施者是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社会实进会）。陶孟和参加了该调查，后来又留学英国，与梁宇皋一起采用了与当时英国社会学中很盛行的都市贫困层研究相叠合的方式，以中国农村和都市的“生活”为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Leong, Y, K& Tao, L. K《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1915),《中国的乡村与城镇生活》)。陶孟和归国后担任社会调查所的所长，参与了多次调查。这一作为调查对象的“生活”，很多情况下都是都市中新诞生的下层劳动者的收入与支出为中心的。具体来说，有陶孟和本人撰写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6)，同是社会调查所的杨西孟撰写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1930)，上海市社会局出版的由刘宝衡撰写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书》(1934)，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杨蔚撰写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这一关注“生活”的眼光，也影响了统管人们的各种组织，出现了如下的调查报告：《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工商部 1929)，《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总报告》(工商部 1930)，袁昂，吴永成撰写的《中大工人生活调查》(1931年)，贾铭撰写的《铁路工人生活调查》(1933)等。近年，这些调查报告的一部分被再收编出版了(李文海等 2004)。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关注“生活”的，还有另一重要人物，Sidney Gamble。与Burgess一样，Gamble是通过基督教会大学向中国引入社会学的另一重要人物。在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从某一特定视角进行的“生活”与“调查”的亲密关系(有关该时期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学调查活动，閻 2004更为详细)。Gamble主要是组织了在北京的调查，作为Burgess的助手，在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和the Peking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援助下进行了Peking: A Social Survey (Gamble 1921)，使用了恩格尔系数等当时的最新理论出版了《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孟天培，Gamble 1925, 1926年。平野正雄将此翻译到日文，《北京に於ける二十五箇年(自1900年至1924年)の物価・工資・生活程度》，1942年)，《Peking Wages》(1929)。有意思的是，Gamble的代表性著作《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 to \$550 silver per month》，在中国或者被直译为《北平的家庭是怎么过活的》，或者被译为《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么生活的》，这正体现了不断变迁的“生活”概念的摇摆。该书于1940年由福武直翻译到日语《北京の支那家族生活》，虽然书的一部分包含了有关冠婚葬祭及衣装等的记述，然而主要内容则是正如副标题所示，是对北京的283户人家的收入，支出和储蓄的基于经济关心的调查分析，并不是今天的囊括一切的“生活”⁴。这里也体现了“生活”概念的摇摆性。

总而言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汉语中使用的“生活”概念的含义之一是，当时被视为社会“问题”的(这里可以回想起当时社会学研究主题之一是犯罪)，以都市为中心的社会下层劳动者们的经济状况的问题，正如当时流行的生活费调查，陶孟和与Gamble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今天应该称为“生计”的问题。而这一时期“生活”的一个侧面，正如在试图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调查形式的吴文藻所曾指出的，“社会调查本可以追溯到法国Frederic le Play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帐簿研究”(吴 1935)。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正是在此延长线上的。

这里讨论的“生活”概念与本次研讨会所论及的“生活”，虽然在有必要改善这一点上有一致之处，然而，在“生活”本身应如何把握方面还有很多不同之处。其最大理由是，上文述及的扩张了的“生活”概念，以在数量上可以把握的具体内容为对象，而今天诺发表所论及的有着一定共通关系的“生活”，可以说显示出的是对那些无法计量的对象的关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关心的是，在对过去的无数可能的应有状态进行有意识无意识地不断选择的同时，依然受到过去的影响；从与有着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相联接，然而又必然转眼即逝的现在这一地平，我们以什么为对象，如何感觉/思考，并处理它们与自己的关系，对它们形成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其实就是面向的是“现在活着的”还是“过去活着的”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参照史料，同时将记忆，口述和身体技法等各种方法置于方法论的中心位置。总而言之，上文以中国的情况为案例，对“生活”这一年看似似乎不言自明的概念，实际上在各个时期，随着各位论述者的关心不同，不断发生着变化，转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简单概括地说，“生活”概念从“生存”，“活着”，演进到活下去的食粮，为了糊口的手段/职业。从这里一部分发展为以收入支出为中心的可以进行数值化计测的对象，另一部分则从活下去这一含义出发，发展为人生指导，以及过日子方法的启蒙等。此外，某一特定时期还出现府指导，介入人们的日常起居，礼仪，交际，以及新时代的时间和金钱使用方法等。如此这般，“生活”概念可以理解为不断变迁，摇摆，在某一时期形成的某种观点，看法。

4. 围绕“生活”的改善，向上运动： 行政的片段化，运动的主体，以及个人化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有关“生活”改善的运动，因此作为各位老师发表的共通内容，可列举以下相互有关系的几点：1) 由行政方面发起的运动带来“生活”的片断化，2) 运动的主体性，3) “生活”的个人化，这些关心点超越了对作为近过去现象的生活改善的相关研究，也是展望今后的民俗学时的重要问题点。

首先，从行政方面试图改善“生活”时，由于将具体对象问题化，也就是说由于有必要确认改善措施和改善成果，通常将“生活”片段化。正如田中老师在主题演讲中提及的，新生活运动时期所谓的“生活”改善，指的是具体的炉灶，厨房，浴室的改善，以及苍蝇，蚊子的驱除；南老师的发表也提到，虽然建设新农村运动包括生活的全部，然而也存在着住宅改良，修整下水沟，和设置共同堆肥场等几个典型的具体焦点。这些问题是改善“生活”，或者是过上“新的生活”时切切实实的必要措施，然而运动的具体对象不再是“生活”本身，也就是说，“生活”与具体对象之间是一种举喻关系。这样的对部分内容进行的“生活”改良，毫无疑问规定了当今我们的生活状态。然而，运动中被改良的这些片断和生活，不再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因为即使把改善的所有项目都合在一起也不能再建构今天我们所论及的“生活”。为了把握“生活”，不仅仅是列举这些被细分的片断化的项目，它还要求包括主观感觉在内的着眼关系性的意识转换。然而，正如上文对“生活”概念的回顾，检讨所显示的，这一概念本身是在以某一问题为对象进行探讨中，不断变化而来的，我们忘却或是忽略了这一点，从而没能将“生活”提炼为民俗学的重要概念。也正是这一思考空白，使得除了极少数研究之外（例如田中 2011等），民俗学对这一就在我们眼前展开，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运动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是虽然对这一由行政体系发起的作为运动的“生活”改善活动进行了系列评论，然而没能充分发挥它可以不断唤起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有关总体性“生活”的讨论，研究的可能性。

上文确认了行政方面有关作为运动开展的“生活”的眼光，在现实的“生活”现场，总体性被分解，细分为具体的需要“改善”的项目而被实施。今天诺发表的第二个共通问题是有关运动的主体性问题。

正如南老师的论文尖锐指出的，着眼主体性，可以为理解目标是刷新“生活”的诸运动提供极为重要的观点⁵。

虽然诸位发表对主体性概念的注目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论及。例如田中老师在讲演指出，生活改善普及员发动地方上的年轻主妇们的力量，由住民们自己发现需要改善的问题，生活改善普及员（行政方面）只是完善解决问题的条件。通过这一采用协助，支援的方法，战后的新生活运动取得了比之前历次由政府主导进行的类似运动都更大的成果，这也反映的是主体性问题。小岛老师的发表中提及的通过行政记录《广报志》对运动的分析结果，与通过对运动的参加者为对象的narrative所显示出的差异；另外，南老师的发表中提及的新农村运动初期配发水泥的事例；周老师的论文中当政者对观光，体面，国民生活的提高等有关说法，与人们自身的都市生活体验等复杂作用下有关主体性的议论等，也是有着相同背景的。不过，山中老师的发表最为正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山中老师以一直保持着交流关系然而不同的两个地方为事例，即使是同样的“没有蚊子和苍蝇”运动，由于对生活中的问题由“谁”，以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的不同，此后的发展也完全不一样。把从这里可以推论的见解，与上文中总结出的将生活作为运动处理带来的生活片断化相联接，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行政主导的以运动形式展开的生活改善，参加主体作为程度不同的代理施行者参与活动，当片断化了的该项目得到改善，运动也就结束了；而由当地人发起，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为目的，以行动主体身份参加的生活改善活动会一直持续，没有完结之时。对于这一主体性的应有形式等问题，民俗学该如何提携合作？对于这一问题群，有必要超越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而作为本次研讨会主题的“生活”，由于其内含的涉及面之广（以及其内含的可变性），应该可以具有极强的召唤力。

今天除了周老师的论文，其他诸位的发表基本上论及的或是过去发生的对“生活”的改善活动，或者是创造“新生活”的运动。然而，现在诸如生活改善运动，新农村运动那样的席卷全体国民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很少了，至少在日本，韩国，有关提高“生活”的努力呈现出委任给个人的倾向。如果确实如此，民俗学又该如何把握，分析这种个人化的提高生活的实践？

正如周老师的论文的厕所革命事例所显示的，即使是厕所这样乍看之下完全是个人现象的问题，也是在与其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专门设备的配备之类的条件，环境，以及技术等互相关联的复杂前提下才成为可能的。详细地考察这样的形成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世界”，找出内省的起点之类的方向性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此时需要强调的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就是通过narrative的方法了解被访谈者所认知的主观性事实，从他们的认知出发重新思考所考察的现象。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得出与行政性的片断化后所理解的“生活”，以及上述的“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截然分开为潜在前提的“社会调查”所把握的“生活”不同的新见解。

另外，即使“生活”的继续构建已经成为个人的事，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依靠个人的创造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不管是自上而下型，还是自下而上型，为了继续构建“生活”，就需要相关的模范，知识，经验，确保解释的回路。这样的个人化，并要求个体成为行动主体的同时，需要模范，知识，以及经验的状况，看来自相矛盾，然而这就要求人们的再次“联接”。在这里，为了更好的未来，或者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有必要解开变迁的关键点这样的从当今出发的需求，作为人们之间的连接点之一，过去的生活“感觉”经验所积累的成果，以及现在进行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可以作为某种资源库进行活用。即使是以过去的运动为核心的资源库，由于它可以再次联接个人化了的人们的功能，也能对同一时代产生水平方向的影响。因为为了利用此资源库聚集而来的人们，是在现在这一时间点上活动的。不管是民俗学一直重视的面对面式关系，还是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以SNS为代表的非面对面式关系，个人化了的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生活的质量，作为伸长了的枝干上的一个核心，如果可以这样在有关“生活”的资料库中找到一个自身的位置，那么人们就不应是孤立的片断，而应在有着一定柔软性，可以变化的网络中被慢慢回收，同时也可能成为形成网络的一

个重要枝杈。可以说,对诸如此类从现在看来什么时候也有伸枝发芽可能性的知识和实践的连接点如何进行社会性的配置,显示了今后的民俗学应该怎样与社会相关联这一问题系的一个方向。

5 结语

上文对虽然时代,对象各不相同,然而都以“生活”及其改善为主题的诸发表中可能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确认以下几点来结束本次的点评。

本文指出各发表所共通的“生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经历了历史性变迁而来的,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下,人们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此概念。很难说民俗学对“生活”概念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也很难说对有关“生”的提高,改善运动积累了充分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诸发表提醒我们,需要通过面对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思考生活改善运动改变了什么,如何将人们席卷其中,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重视,然而毫无疑问正是我们的“生活”立足点。如果是这样,那么对这一不断发生着变化,然而一直显示着其存在感的概念,今天的民俗学该如何把握?为此,又该如何展开有关此概念的研究?这是今天的民俗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注释

- 1 本稿是日本民俗学会国际研讨会“没被在意的日常/不断变化的日常”的第一部“对象:生活变化与生活改善”的点评稿的修正稿。
- 2 当时汉语中的“生理”一词,有着与“职业”相近的含义。
- 3 研讨会上,也是当天发表者的周星老师指出,今天的汉语中,与“生活”一词相当的词汇应该是“民生”。特笔以示感谢。有关本文论及的在中国“生活”概念的变迁过程的更为详细的分析,包括受日本的影响,燕京大学田野调查实验区的成果等,都置于当时社会学的调查背景下的详细分析将在别稿中述及。
- 4 由于是翻译语的问题,福武的译书按照当时的原样。
- 5 研讨会的讨论中,伊藤亚人老师指出,在“生活”改善运动被论及,以及具体实施时,活动的主体通常都暧昧地不被正面地提及,因此被命令需要改善的对象都成了泛指的人们”。在感谢伊藤老师的指摘的同时,笔者还想补充说明,这也正好可以与近年来中国民俗学一直讨论的问题系,也就是说,“民俗”的“民”究竟指的是谁的问题相衔接。

参考文献

- 岩本通弥 2009 「生活」から「民俗」へ—日本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と民俗学」東国大学校文化学術院日本学研究所(編)『日本学』第29輯、東国大学校文化学術院日本学研究所
- 岩本通弥 2011 「家族をめぐる二つの生活改善運動 民力涵養運動と新生活運動」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運動の生活改善運動と新生活運動』、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 閻明 2004 『一門学科與一個時代:社会学在中国』、清華大学出版社
- 許威漢・陳秋祥(主編) 2002 『漢字古今義合解字典』、上海世紀出版社
- 許少峰(主編) 1997 『近代漢語詞典』、團結出版社

- 呉文藻 1935(1990) 「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趨勢」『呉文藻人類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 高名凱・劉正燊 1958 『現代漢語外来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
- 田中宣一 2011 「生活改善諸活動について」『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運動の生活改善運動と新生活運動』、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 孟天培・Gamble, S. D. 1925・1926 「二十五来北京之物価工資及生活程度」李景漢訳（平野正雄訳、1942『北京に於ける二十五箇年(自1900年至1924年)の物価・工資・生活程度』）
- 李文海ほか(編) 2004 『民国時期社会調査叢編・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 龍向洋 2010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図書館蔵民国時期図書総目』、広西師範大学出版社
- 林語堂 1937(1952) 『生活の発見』、創元社（阪本勝訳、1952『人生をいかに生きるか』上下、講談社）、(原著：Yutang, Lin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New York, John Day)
- H. Giles, 1892(1912 second ed),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 Enlarged, in Shanghai, London.
- K.Hemeling, 1916,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 話> an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 O.Z.Tsang, 1929, “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 The Republican Press.
- P.Poletti, 1905,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S.D.Gamble, 1921, “Peking: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 George H.Doran.
- S.D.Gamble, (field work in charge of Wang Ho-Chen and Liang Jen-ho), 1933, “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 to \$550 silver per month”, New York : Funk & Wagnalls. (福武直訳、1940『北京の支那家族生活』、生活出版社)